

内部发行，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研讨实录

第 100 期

100

孟晓犁：大数据时代的发展需求：机器人还是大机器人
周延礼：深化保险改革，维护金融安全
“互联网基础设施业务的性质和影响”研讨会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868号办公A楼802室 Address : Rm 802, Office Building A, 868 Longhua East Road, Shanghai, China
邮编：200023 ZipCode : 200023
电话：86-21-62188752 Tel : 86-21-62188752
传真：86-21-62188714 Fax : 86-21-62188714
网址：www.sdrf.org.cn WebSite : www.sdrf.org.cn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编
二〇一七年八月

序 言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于 1993 年成立，以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事业为宗旨；以募集、运作资金，研究、交流、资助、奖励有关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项目为业务范围。

2005 年以来，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业务开展方面进行了更多有益探索，推出了每月的“上海发展沙龙”主题活动，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合作，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和实业界人士进行演讲，与听众进行交流。时至今日，沙龙已经活动了 90 多次，成为了基金会有一个品牌。

从 2007 年开始，基金会在每年的年中举办“世界和中国经济论坛”，重点分析全球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在每年的年末举办“中国经济论坛”，着重分析当年的经济形势，展望来年的经济走势。

2009 年和 2010 年，基金会又分别召开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海内外著名学者、经济学家、投资者、金融和商界人士，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基金会从 2009 年开始至今，与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合作，每年连续合办“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专题圆桌讨论会，针对城市化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基金会也将知名专家和基金会自身的部分研究成果编撰成书，“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丛书”已出版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新型城市化：抉择和路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我们希望能够将有价值的见解与朋友们分享，因此把沙龙和研讨会的一些精彩内容陆续编辑成册，称为“研讨实录”，不定期的发行，旨在将这些活动的互动过程尽量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给我们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以使基金会能够更上层楼！

是为序。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会会长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胡旭照' (Hu Xizhao).

编者的话

本期《研讨实录》收录了最近三次学术活动的实录。分别是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举办的第 129 期沙龙——孟晓犁先生的演讲“大数据时代的发展需求：机器人还是大机器人”，第 130 期沙龙——周延礼先生的演讲“深化保险改革，维护金融安全”，以及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与《科学发展》举办的 2017 年第 4 期系列座谈会“互联网基础设施业务的性质和影响”。

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孟晓犁先生在“大数据时代的发展需求：机器人还是大机器人”的演讲中，介绍了统计学的概念，并解释为什么美国大选前民意调查几乎都看好希拉里，结果却是特朗普赢了。因为在民意调查中，有大量的低质量数据——许多人或因惧怕暴露自己的真实观点，或因对媒体的反感而有意误导调查人员，导致调查数据的可靠性降低，有效样本的比例大大低于通常情况。他指出大数据很重要，智能机器人的数据处理能力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能够担负重任的人——大机器人。机器人的特点是造期短、见效快、数量大；大机器人的特点是造期长、见效慢、数量少，所谓百年育人。他提出了教育上的建议：1、培养大机器人需要人脑工程师——教师，教师的素质和能力是关键。2、培养越早越有效——盖新房比改造老房容易且便宜。3、通识教育与专业培养要互补共进。4、要培养 T 型人才（既有通

识，又是专家)，甚至 π 型人才（既有通识，又是两方面的专家）。

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周延礼先生在“深化保险改革，维护金融安全”的演讲中指出，中国保险业在用近 40 年的时间按走过了西方好多国家 300 年所走过的路程。保险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保险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保险服务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提升，保险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持续增强，保险监管体系不断完善。保险业发展也面临这一系列的风险挑战，主要包括：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挑战，保险业供给能力不足，科技发展给保险业带来的挑战，保险业对外开放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保险是吸收风险和管理风险的特殊行业，必须有效履行风险管理职能，加强对自身风险的管控，绝不能由“风险的管理者”异化为“风险制造者”。全行业要把防控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深入治理市场乱象，果断处置一批潜在风险点，完善防控风险的长效机制，切实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既要防“黑天鹅”（小概率而影响巨大的事件），也要防“灰犀牛”（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

在“互联网基础设施业务的性质和影响”的研讨会上，秦朔先生作了引导性发言，随后专家们围绕三个主题进行了讨论：互联网基础设施业务的性质，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如何引导和规范这类影响。专家们认为互联网公司有一部分业务，例如支付，是属于金融基础设施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专家们充分肯定了提供互联网基础设施业务的公司对打破垄断、鼓励创新的积极作用，但认为对其产生的负外部性也要予以关注，政府要对其进行规范、监管，甚至加以统一。

更为详细的精彩内容，请大家阅读本期《研讨实录》。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七日

目 录

孟晓犁：大数据时代的发展需求：机器人还是大机器人.....	1
周延礼：深化保险改革，维护金融安全.....	21
互联网基础设施业务的性质和影响.....	42

大数据时代的发展需求：机器人还是大器人

孟晓犁

哈佛大学统计学教授，前系主任

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研究生院院长

上海发展沙龙第 129 期 2017 年 7 月 7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各位来宾，请大家安静一下，我们沙龙的演讲马上开始。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和荣幸地邀请了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孟晓犁教授给我们做演讲。孟教授出生于上海，复旦大学统计学本科毕业，又是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概率统计的研究生。1987 年，他在哈佛大学获得统计硕士，1990 年获得哈佛大学统计学博士。这之后，他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然后又回到哈佛大学，先担任统计学教授，也担任过统计系的系主任。从 2012 年 8 月至今，他担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研究生院院长。这里我简单解释一下，美国的大学的机构设置和中国的大学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的很多大学，经济学院下面有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美国像哈佛这样的大学是这样的，它有专业学院，如商学院、医学院、教育学完、法学院；这些学院没有本科生，培养的大部分是硕士与博士。除了专业的学院以外，剩下的一大块，都叫文理学院，所有你能想到的学科，包括数学、化学、物理、历史等等都是在文理学院里。文理学院有本科，也有研究生院，本科上面的研究生院就是我们孟教授负责的。这样的设置有它的合理性，当然今天我们不讲这个。2013 年我听过孟教授的演讲，讲

的非常好，当时我就想请他来，后来因为很多阴差阳错，一直到最近施宇澄帮忙，最后终于能请到孟教授。他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大数据时代的发展需求：机器人还是大机器人”。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孟教授。

孟晓犁（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研究生院院长）：首先我要谢谢乔依德先生的邀请。我们以前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是重叠的。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和大家做一些交流。

我首先要做小小的声明，我今天讲的不代表哈佛，也不完全代表我自己，因为很多东西是它人的经验。我在这儿只和你们做一个交流。现在不管你到哪里，大家都谈在到大数据。我本人是搞统计的，所以这一切都对我很亲切，但以前搞统计并不是很红的事情。甚至十多年以前还是如此。那时候如果人家问我，你是做什么的？我说我是教统计的。人家第一个反应就说，“那是我最恨的课”，或者“那个课最要命”。那时候很有意思，我如果坐飞机不愿意跟旁边的人讲话，我只要说我是教统计的，那么旁边的人就没有兴趣再继续讲话了。唯一没有成功的一次，那个人非常激动，他说他是教数学的。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别人会说，你是搞大数据的，你讲讲大数据到底是怎么回事。乔依德邀请我来演讲的时候，我就想到底应该讲什么。我今天要讲的一点是，如果你把大数据的数据质量考虑进去，它并不一定像你想得那么大。另外，我除了教统计以外，也想了不少关于教育的问题。我知道乔依德邀请我，也是要我讲一些关于教育的想法，在培养人才方面，特别是在大数据时代怎么样培养人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讲到机器人，大家的感觉就是像人的样子，影片上都有

这样的机器人。但是今天我要强调的是，其实是我们把机器人造成这个样子的，完全是为了符合我们的美感需要——有智慧的机器人就应该长得像一个人。其实对大多机器人来讲，它们的眼睛、鼻子、嘴巴都是没有用的，完全可以不这么做。对于一个机器人来讲，通常它所有的信息是通过数据输入的，对不对？这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致命伤。它的优点在于所有信息都是数字化的，计算机特别能够处理数字的信息，速度可以很快，数据量可以很大。现在这个大数据的致命弱点在什么地方？第一，你一定要把东西量化，计算机才能做运算。但很多东西不一定能量化，大家都知道，中医搭脉的时候，并不像西医看指标。中医从搭脉感受到信息，到最后做决定，并不是一个量化的过程。对于不能被量化的东西，至少现在不能被量化的东西，就没有大数据可言。第二，在这个量化的过程当中，坏的量化质量可以比没数据更糟，这个我后面要讲到。

机器人大家都知道，便于大家作对比，我造了一个词“大器人”，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中国人有个讲法“大器晚成”，我强调的不是晚成，而是“大器”。在现在这个社会里，我们培养的人要能够处理一些难题。刚才我们在饭桌上谈到互联网叫车的问题，空气污染的问题，这就是很难的问题。难在什么地方？难在没有答案，给出的答案本身又会造成新的问题。处理这些社会问题，需要的人才不光是搞科学的，还是搞人文的，还是搞社会科学的，所有这些都要。比如气候变化这个问题，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不光是科学的问题，很多是政策问题，是国际关系问题。这些问题要考虑的策略，都是很复杂的。如果我们真的要培养大器人的话，他们并不一定需要有每种知识，但是要有想法，看到这个

问题的时候，要意识到处理这些问题不能光从一个角度看，要想得非常全面。

大脑实际上是一个信息引擎，通过我们的五官，通过我们的触摸，得到信息。我们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脑子是怎么工作的，所以现在对人脑的研究是一个非常红的领域。人脑会很快做出反应，作出决定。而且人脑在反应的时候，不一定通过量化的过程。你想东西的时候，脑子里有很多数据，但人脑如何处理这些数据我们就不清楚了。比如我看到一个人的脸，如果我以前见过一次面，第二次看我会说这个人很熟悉，我并没有把它量化。计算机在看人的脸，要把它全部量化过以后，然后再处理。量化有它的好处，但也有它的局限性。从信息处理的角度看，大数据实际是一个巨大的大脑，它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它把所有看到的事情都放在一起。网上说大数据是大脑，但我强调的是，它不光是一个大脑，还是一个巨大的大脑，它把很多人的大脑集合起来。比如我们以前开车要去什么地方，你可能打个电话告诉朋友说那段堵不堵。美国现在用的很多 Waze APP（导航软件）把许多人提供的信息全部汇集起来。但是它有一个很大局限性，就是必须取决于大家都去上报路况信息，如果大家不上报，它这个大脑再大，并不一定有很好的智慧。在美国，因为有大量的人一直在往上报路况信息，所以 Waze 就很好用。在上海我今天就被严重的误导了一次，因为很少人在用。

中国有一句话叫“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现在的大数据，不是三个臭皮匠，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几亿个臭皮匠全部放进去。但累加本身并不等于有智慧。在 2015 年波士顿美国医校商界（HUB）的开场论坛中，以“正义课”

而闻名的哈佛教授桑德斯牵头了麻省理工大学教授麦克菲尔与著名小提琴家马友友之间的一场争论。大学里有写作课，有人想把以前改过的卷子作为大数据，做一个算法，来看看是否可以用 APP 来替代教授改卷子。对于用机器改学生的作文这个设想，大家猜一猜，是反对的人多，还是赞成的人多？你们说的对，反对的人多。赞成者麦克菲尔教授的理论是，用机器来改卷的话确实有问题，但是如果有很多卷子，教授也没有精力去改，如果让助教去改，助教个人的方法和规范也有一些变化。用大数据做出来的 APP，至少是集合了大量的资料，所以他觉得，最理想的当然是每个教授认真做改卷子，但是学生很多做不过来的话，还不如用这么一个机器来做。马友友极力反对。他当时非常激动，因为他觉得这么做是绝对不可以的。他说教拉琴，对音乐的理解，这个是不可能量化的。写文章也是一样，文章的好坏，里面很多东西是不可能量化的。所以他觉得，如果用这种机器人去改卷子的话，那是人类的一个大倒退。

我以前在复旦大学读数学的时候，数学系是非常非常专的；就是数学，没有其他的東西。当然我们也学政治课、体育课；这个不管谁都要学的，除了那个以外，都是纯数学。我为什么要讲这个？纯数学读得多有很大的好处，到现在为止，我做统计用的数学工具都是那时候学的。我们的底子非常好，国际上很少有同学能跟我们比，那时候基础打得非常扎实。但是，我们的知识面是非常非常窄的，如果用那时的思维就很难欣赏马友友的论点。作为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我要负责 56 个系。我每年要去每个系开会。他们总觉得，一个院长到我系里来开会，至少对我们系做什么应该有点了解。我第一次去罗曼语系（包括法语、意大利

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罗曼什语、加泰罗尼亚语等)，还没有走到，我就出了一身冷汗，因为我并不知道罗曼语系里有多少语种。我知道有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其他我就知道了。当然现在你要知道，网上查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我要讲的是，我那时候做学生的时候，永远不会想到我将来会到哈佛做院长。现在的学生，以后的工作要换好几次，不光换工作，还要换专业，跟我们以前不一样。所以现在 we 培养人的时候，特别要注意怎么培养多方面的人才。我们那时只是专业底子打的很好，但我现在就比较累了。当然可以在工作中学习，但这个总比人家慢一步。我们当初也没学什么历史、心理学等等，这些东西都没有。

What Does “Harvard Education” mean?

（“哈佛教育”意味着什么？）

- Not just about knowledge and skills
（不只是知识和技能）
- It is about the “6C”s （是关于六个“C”）：
 - Citizenship（公民意识）
 - Compassion（同情心）
 - Creativity（创造力）
 - 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考）
 - Connecting Dots（触类旁通）
 - Communication Skills（沟通能力）

图 1：“哈佛教育”意味着什么？

大概是六年前，复旦一个校友会请我演讲，要我解释所谓的哈佛教育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当初我去到哈佛的

时候，我的数学在系里基本没有人可以跟我比，但是其他东西根本没有学过。哈佛的教育，还有其他好的学校，教的并不只是知识和技能。我自己总结了一下，可以概括为六个C（中文是我这次加上去的）。

第一个C，公民意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哈佛文理学院（本科）院的院长来讲的话，他第一句话就说，哈佛本科院的宗旨就是培养好公民和公民领袖。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做任何事情，你要考虑的不光是本人的利益、局部的利益，要考虑更多方面的利益。

第二个C，同情心。现在的社会竞争非常厉害，我讲的这个东西，并不是从政治上来讲，而是从实际生活上面去讲。如果一个人没有同情心的话，早晚守不住他的底线。美国人很讲同情心。中学有规定，我女儿、儿子一定要为社区做点什么，比如到养老院。他们从小非常强调这一点，最关键的就是培养同情心。

第三个C，创造力。这个非常重要。特别是现在进入机器人时代，你如果要比机器做得更好，一定要有创造力，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第四个C，批判性思考。什么东西看了以后，你不是马上顺应潮流，一定要有思考。这方面属于人文教学，哈佛做得特别多。哈佛是综合大学，不光教科学、社会科学，还有人文，全部是批判性思维。什么事发生了，学生通过批判性思维去看，从中可以得到一些教训。

第五个C，触类旁通。我刚才讲了，现在很多问题都不是只做一方面，而是要做很多方面。你要借鉴几方面的经验和思想，所以我们现在非常强调触类旁通。

最后一个C，沟通能力。我本人强调非常多。大家也会

同意，相对来讲中国学生比较缺沟通能力。沟通能力在美国常规讲就两点，一个是口才，一个是写作。现在如果到麻省理工，到斯坦福，他们都另外加上一条，怎么样通过数据去说服人家，怎么做图表。这是另外一大部分，叫 Data Visualization（数据可视化）。

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有一个校报的记者自己翻译了我的 6C，基本翻译的不错，但她把我讲的“公民意识”翻成“市民意识”。市民有时候有点小市民，有点贬义，我觉得这可能反映我们学生对公民意识理解不够深，想成市民意识了。公民意识和市民意识还是有区别的，我要强调的是公民意识，不是市民意识。

下面我通过几个统计的例子，来讲两点。一个是怎样有批判性思考，另一个是大数据最大的问题——不能只强调数量，而不重视数据的质量。如果数据的质量不好，有效数据的数量便是很小。

统计做得好的话，可以得到很多好的结果。像 Waze 导航软件就用巨大的数据在算，当数据量充足的时候，可以让我很快的到达目的地。我觉得对统计最好的解释，用以前毛主席的话就是“去伪存真”。为什么数据是有用的？每个数据都有变化，是吧？如果你拿了一大堆数据，全都等于 1，一点用处都没有。它的信息是在变量里得到的。但是数据里面又有信息，又有很多噪音。统计主要是运用概率的方法，去描述事物中的不确定性，从而区分数据中的信息与噪音。对大家来讲，你主要要学的不是统计方法，而是要学统计思想。统计思想是运用对统计规律的理解去作出正确的推断与决策。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统计思想呢？所谓能够成“大器”的人，不管你学什么课，一定要有这些统计思想。因

为现在如果没有统计思想的话，到时候连报纸你都看不懂，媒体会用很多东西来糊弄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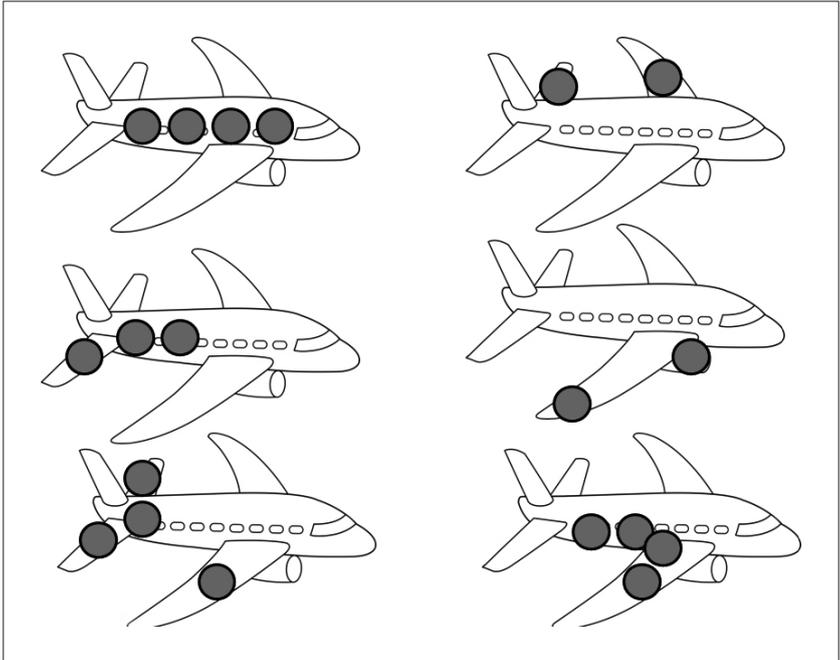


图 2：统计数据：对返航飞机的损伤统计

统计历史上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能够说明统计思想的重要性。当年二战的时候，美国海军要做实验，航空母舰上开出去很多飞机，有的飞机被打掉了，有的飞机回来了。他们想知道，怎么加固飞机才不容易被打掉。当时海军查看所有回来的飞机，发现飞机上很多地方有洞（弹孔），他们打算哪些地方最容易被打到，就加固那里。当时有一个著名的统计学教授亚伯拉罕·瓦尔德（Abraham Wald），他是序贯决策理论的创始人。瓦尔德教授看了海军的决定以后，说你们完全做错了，你要补的不是有洞的地方，你要补的是没

有洞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看到的飞机都是能够回来的飞机，说明尽管有洞，它还能撑回来。没有回来的飞机，才是真正要被关注的。你看到的数据，其实并不是你真正要的数据。其实被打掉的飞机，大多是打在飞机的机头。结果海军马上做出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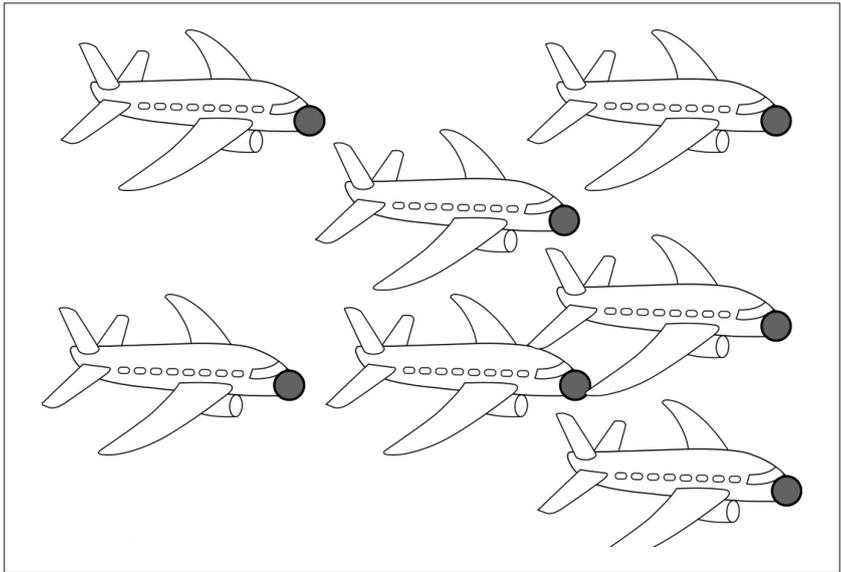


图 3：缺失的数据：未返航飞机的损伤部位

我要强调的是，机器很难做到这点，它根本无法看到这些数据，但人有判断能力。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也是很深的道理，统计上叫“条件统计”。你要的是怎么不让飞机被打掉，而不是怎么把没有打掉的飞机加固，加固当然也要，但是那是第二重要的。瓦尔德教授当年创造了序贯决策理论，什么意思呢？当年海军要试炮弹里面到底有多少坏的，但是试炮弹的时候，不可以把它们全部试完，试完就没有用了。试的时候他们发现，有的时候连打五发全部是坏的，也可能

五发全部是好的，在什么时候你应该停下来？你挑一颗打出去是好的，挑两颗打出去是好的，但是挑到什么时候，后面好的概率就增大了？这套序贯理论后来发展得非常有用。（可惜的是，瓦尔德教授和太太去印度讲课，结果飞机失事了，所以他去世的很早。）数学只是一个语言，最关键的是这些统计思想，如果想法不对的话，搜集很多数据，做的完全可能是相反的事。

我刚才讲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选择偏差（Selection Bias）。回来的那些飞机，是存活的那些，不是一个随机样本。统计都讲随机样本，但回来的飞机不是随机的，这就有很大的误差。为什么讲这一点呢？因为常常你看到的数据，是人家自己愿意报的，不是随机的抽样，这里面就有很大得差别。选择偏差告诉我们，不仅要知道数据，更要知道数据的收集过程。因为这个搜集的过程决定数据的质量。大数据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以为现在有那么多数据，只有分析就可以了，至于数据怎么搜集来的被忽略了。选举的时候，民意测验的数据是随机的，还是人家自己报的，这里面有天渊之别。所以说一定要知道搜集数据的过程，这个决定数据的质量，质量远重于数量。选择偏差造成的低质量数据，会严重误导我们，就像刚才的飞机问题。但是最惨的问题是什么呢？低质量的数据越多，你被误导就越严重。因为大家会觉得，这么大的数据，结果一定可靠。

我现在讲一下这个民意调查。你们很多人学过统计，我给大家考个试。假设你在美国做一项民意调查，美国人口 3.2 亿，你做了 1 千人的民意调查，如果你在中国要得到同样的精度，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 4 倍，你应该选多少个人？

假设你在美国进行一项1000人的民意调查(人口总数约3.2亿)。在中国做同样调查需要多少人数能得出类似的精确度(中国人口约为美国的四倍)?

1. 1000
2. 2000
3. 4000
4. >4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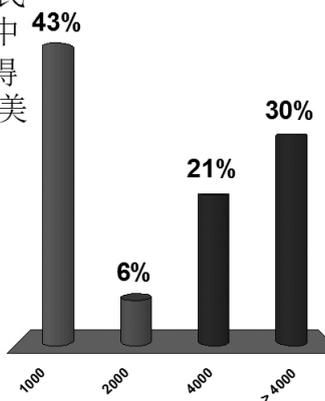


图 4：民意调查的取样数量

听众：也是 1 千。

孟晓犁：大家统计学的很好。如果随机的话，还是 1 千。我以前在另外的地方问过人家，很多人会说 4 千，因为有 4 倍的人数。这个怎么解释呢？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在 3.2 亿这么多人中抽 1 千个人，怎么就能够达到精确度呢？现在我们已经很习惯了，但是当年这个概念是通过半个世纪才被接受的。当年挪威人口调查局的局长在推广这个概念时，人们是不相信的。

中国 14 亿人口，只抽 1 千个人，怎么可能得到结果？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假设。如果大家品尝一碗汤，假设这个汤搅拌得很均匀，你品几口可以作出判断？不管是一碗汤还是一大桶汤，关键是使它均匀了。在收集数据上，什么叫均匀呢？就是随机抽样。最简单的随机抽样，就是保证每个人被抽到的概率是一样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均匀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如果是质量高的数据，随机抽样并不需

要大数据。当数据质量低的时候，你尽管有很多数据，可能真正的样本量其实是很小的。

品味汤

如果汤是搅拌均匀的

- 品尝几口就可以作出可靠判断，
- 无论是一小碗还是一大桶！



- 随机抽样 = 搅拌均匀
- 可靠的结果可以从少量高质量的数据中得到

图 5：品味汤与取样数量

再举个例子。民意调查，你会不会投希拉里一票？如果随机抽样，每个人按照事实报的话，跟他选谁是没有关系的。不是说因为要投希拉里的票，我才如实报；如果我不投，我就不如实报；如果那样的话，你的样本是绝对不均匀的。美国有选举权的人有 2.3 亿，如果取 1%，就是 230 万。如果我从这 230 万人中看，等于你做 2300 个抽样调查，每个抽样调查是 1 千个人。这个数据已经很大了。但是如果很多人想投特朗普的票，却不敢说，因为他们知道说的话，特别是在学校里面，会找人骂。民意调查的时候，愿意投希拉里票的人更愿意如实报，这个概率如果是 0.1% 的话，实际的样本按照统计公式计算就只有 400（略去其中的数学推导过程）。什么意思？我表面上有 230 万的数据，但是因为数据里面有一点偏差，真正的数据只是 400，所以这个 0.1% 的超报概率造成了 99.98% 的损失率。这叫“失之毫厘，谬

之千里”。就像你在望远镜里月亮，角度稍微差一点点就完全看不到，它就有这样的放大作用。我用这个例子想说明的是，大数据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统计理论、算法和结论，都是假设数据是均匀的、有代表性的。如果没有代表性，尽管误差很小，在大样本的情况下，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我当初和一些美国人说，如果你告诉希拉里团队的人，这个从 2300 个抽样调查得到的结果等于只有 400 个人的调查，那么她不一定会掉以轻心。

$$\text{实际样本量} \approx \frac{f}{1-f} \frac{1}{\rho^2}$$

- 例：f=1% 美国2016可投票人口: 2,300,000
 相对与2300个抽样调查，每个1000人
- 如果 $\rho = 0.005$ (等于希拉里选民有0.1%超报概率)
- $$\text{实际样本量} \approx \frac{0.01}{0.99} \frac{1}{0.005^2} \approx 400$$
- 所以，0.1%超报概率造成 99.98% 样本损失！

图 6：低质量使“大”数据变得很小

总结一下，“机器人”还是“大机器人”，我的想法是，两种当然都要，但是我们更要强调投资培养“大机器人”。很简单的道理，机器人，造期短、见效快、数量大。特别是像各种 APP，厂方都愿意做。但是你要培养人才的话，造期长、见效慢、数量少。培养人才可能要几十年以后才能看到果效，但是你绝对不能不做。大家也知道，机器人的发展绝对离不开这些能够成大器的人。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乔布斯，

当年他被苹果赶出去，最后苹果还得把他请回来。被请回来以后，他做了一大堆事情，一个人的力量非常不得了。我的建议就是说，制造机器人需要的是电脑工程师，但是培养大器的人，需要人脑工程师，也就是教师，灵魂的工程师。培养人才，越早越有效。盖新房比改造老房子要简单的多。等到他形成了很多想法再去改变的话，总是困难的。我们比较强调通识教育和专业培养同时进行，专业教育就像我以前学的，通试教育并不只是强调每个人知识面要广，而是强调每个人要具备处理问题的综合能力。

- 制造机器人 需要电脑工程师
- 培养大器人 需要人脑工程师 --- 教师
- 培养越早越有效 --- 盖新房比改老房容易又便宜
- 通识教育与专业培养互补共进
- 培养 T 型甚至 π 型的人才(梳子型有些过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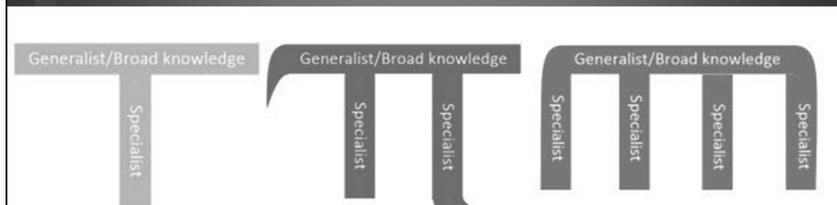


图 7：教育上的建议

所以现在在国外，有人强调所谓的 T 字形，一个人既要深度，又要广度。后来又有人提出 π 形，就是你要有两种专业，单单一个专业还不够。还有人提倡梳子型，即多种专业，我本人觉得这有点过分，专业太多也就不是专业了。我们院里现在强调的，包括沟通力、团队精神、抵抗精神压力的能力。但是我要给大家一个警示，就是前面我跟你们讲

的，最大的问题是存在选择偏差——我讲的东西，当然有我的选择偏差，因为我是搞教育的，又是搞统计的，所以我当然强调这些东西。大家在处理我讲的信息的时候，要考虑到我讲的可能也有一些偏差的。谢谢大家。

乔依德：非常感谢孟教授给我们做了一个很精彩的报告。他讲的东西有宽度，又有深度，是我们平时不太能听到的。下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大家可以提一些问题。

甘贻静：孟教授你好，非常感谢你这么精彩的演讲。你在演讲中提到统计学这门功课，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感觉压力非常大，真的很难。如何把这么深奥的统计理论与企业管理进行一个接口？企业有时候在面对数据的时候，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利用统计学数据。

孟晓犁：你讲的非常对。我们以往为什么觉得统计很难学？因为我们通常以数学的观点来教统计。通常都是从所谓的正态分布，T分布，等方差，不等方差，所有的材料都是由学数学出身的人安排的。我们教的时候，全部改掉，把实际生活的例子拿来阐述统计方法。我们拿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看需要什么工具，就教什么工具。你们有没有看到过，网上有很多公司说要帮客户找对象，他们怎么做的？他们搜集数据，让你填一个表，到时候按照你的回答跟其他人的回答，通过一个统计的回归分析，来看你们两个将来相配的概率是多少，概率大到一定程度，你们两个就可以见面了。我的学生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我说你怎么建立这个概率模型，需要什么东西，这就和实际有关了。

如果你是主管，你本人并不需要知道这些东西具体是怎么算的，但是你要知道，人家算的东西是不是你要的。比如之前的例子，我要知道的是没有回来的飞机的情况，具体怎

么算是另外一回事。一个高管应该有这些统计思想，然后你可以雇一些统计的专业人员。但是你如果没有想法，跟专业人员沟通是很困难的，他学的往往是书本上的东西，很机械的。我们培养的统计学家，他们出来以后，就可以跟你沟通。现在已经比以前好多了，以前很多培养出来的人完全是纸上谈兵。我刚去美国时，觉得最难的事情是作业全部是文字，而国内的作业全部是公式，我当时最恨的就是文字问题，我要把它翻译成公式。其实我不知道，那个是最要学的东西，就是把你日常问的问题如何变成公式，然后才能运算。这个变成公式的过程，是需要很多统计思想的。我们现在教学生，尽量强调这部分。你们公司里要有不同层次的人，不要认为这个问题找几个做统计的人就行了，你一定要培养有自己想法的人，并不一定自己要知道怎么算。

左学金：我想向孟教授请教一下，能不能谈谈哈佛大学本科生怎么处理通识和专业教育？你们第一年文理分吗？

孟晓犁：美国大多数是不分的。美国大学本科头二年一般是不分专业的。哈佛到二年级快结束的时候，学生自己要决定选哪一门专业。第二我们有通识教育的要求，每个学生一定要选8门课。我前面讲的6个C，就是从这里面总结出来的。但是我要说明，哈佛在这方面做的并不是很成功。最近我们的一个教研组织，对我们过去几年的做法做了评估，最后的结论是现在的通识教育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现在做的通识教育，只是让大家去学几门课。开课是一大难题，比如关于气候变化的课就很难开，因为真的要开这门课，任何一个教授的知识面都太窄，要有一批人一起上，这个不容易做。所以现在我们也正在改革，怎么把通识教育变成真正的通识。美国大学很多有写作课，不管你是什么学

科，一定要通过这个写作。哈佛刚刚决定，不论什么专业，一定要选一门数据科学。这门课的要求出来了，但是课本身还没有开出来，我也在参与准备。

左学金：另外一个问题，中国正在进行教育改革，你对中国教育改革有什么建议吗？

孟晓犁：我对国内现在的情况很不了解。我希望能够保持我们以前学得那么深，另外再加宽。当初我们学的深，学的非常好，但是深的太多了一点。这里面你可以做一些选择，留一些余地，让他们能够选一些其他课。通识教育难在师资本身，因为我们这些老师都不一定有这么一个教育资质。教好统计课是很难的，如果老师本身没有做过具体的数据分析，都是纸上谈兵，我们非常强调研究和教学不分开。像我自己，我做院长，保持研究，保持教学。我现在教研涉及很多方面，大都是和天体物理学家一起做的，否则过一段时间就变成纸上谈兵了。其实真的做好教研，对教师要求非常高，既要做好研究，又要做好讲学，又要培养学生，这是很辛苦的。哈佛招教员的时候非常严格，我们要看三方面，研究当然是第一，还有教学，还有教员的公民意识，不能招只想成名，不管学生的教员，这是很重要的。如果长期打算的话，教员的培训一定要加强。

于新建：孟教授，你好！非常感谢你今天晚上的演讲。我现在在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今年读大二，我学的是计算机和金融工程，对你今天的题目很感兴趣。我觉得对我们学校来说，缺乏的就是大器。你刚才提到公民意识，我觉得这个是我所接受的教育中最缺乏的。所以第一个问题是，可不可以具体解释一下何为公民意识，做到怎么样才算有了公民意识？第二个问题是，通识教育是否适合所有人？

谢谢。

孟晓犁：你提了两个很棒的问题。你是在 CMU 念书是吧？那是一个很好的学校，它的计算机和金融都是很好的。你有没有去它的统计系学过课？因为 CMU 的统计也是非常强的。你提的很好，对于真正的公民意识，大家都有一个模糊的概念，真要定义它的话，也是很难的。像我们平时学校里强调的，一个人怎么看自己在社会里的贡献，不是嘴上讲如何给社会做贡献，而是你在学这些东西的时候就要想到，我现在学的这部分知识以后对社会哪些方面我可以做出比较有用的贡献。另外呢，公民意识里很多是讲团体精神，我们有很多题目都是 TEAM WORK。你不能只讲我的成绩好，你要想到的是，要大家的业绩好。有的时候，我们让大家互相评估，不是老师评估他们，每个人都评估团队的成员，他的贡献是多少，一定要有团体精神。你刚才的第二个问题也是很好的问题。我本人觉得，通识教育，像任何东西一样，并不一定对每个人都适合，但是很难说谁不适合。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尽量有不同的课，让每个人有一些选择，没有人反对自己更广一点。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大器人。对教育界来讲，你把这个分母做得越大越好，尽管出人才的比例比较小，分母加大的话，分子将来也会大。从你个人来讲，很关键的一点是有一个好的导师，可以给你指导。教育界怎么去看这个问题，哪些人应该鼓励做这方面，哪些人应该鼓励做另外一方面，这里是有一些可以反思的问题。

喻浩明：你对大数据，包括有关统计的教育观点，非常好。特别是讲到统计思想，我们很多仅仅把统计作为一个技术。我以前读过你说的那个统计故事。统计本质上要反映现实，它跟数学不同，数学完全就是抽象的。我当初读大学



时有一门课叫数学物理方法，为什么要加上物理，因为物理学使得数学公式里那些变量变得有意义。实际上统计学就是要解决现实的问题，我觉得国内教学在这个上面需要再加强。

孟晓犁：非常同意。国内统计以前是学苏联的，数理统计上做得比较理论化，现在好多了。

乔依德：时间差不多了。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孟教授精彩的演讲表示感谢，也谢谢大家周五晚上还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深化保险改革，维护金融安全

周延礼
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

上海发展沙龙第 130 期 2017 年 7 月 31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今晚的沙龙，我们很荣幸地请来了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周延礼先生给我们做演讲。周先生毕业于辽宁财经学院，高级经济师，现任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际金融论坛副主席，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他 90 年代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担任国际部总经理，90 年代末是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财产保险监管部的主要负责人。然后到中国保监会上海保险监管办公室担任主任，一直到 2003 年。他在上海工作了四年，然后到北京中国保监会任主席助理，后来任副主席，最后任副主席、党委副书记、机关党委书记。这是他整个的工作经历，他既有保险的实际工作经验，也有基层的监管经验，然后有高层的监管经历。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周主席给我们做演讲。

周延礼（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谢谢主持人。依德秘书长和我是 20 多年相知相交的好朋友，在座的各位也有很多是我的好朋友。所以今天到上海来，更加激发了我的上海的情结。今天在没有进到这个会场之前，我们在老朋友一起交流的时候，我说我的上海情结如此之重，得益于我在上海工作。这 20 多年来，我们家每天到傍晚 5 点半左右，我们都会在家里看东方卫视。从娱乐星天地开始，一直到一个钟

头的上海新闻，然后是东方卫视转播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从新闻中，我不但了解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成果，还了解了上海市民的生活状况，同时对上海的文化事业也随时跟踪学习。我本人也订阅了上海的解放日报、新民晚报、上海的支部生活等刊物。对我来讲，这种特殊的上海情结感受可真是一言难表。今天这个活动能够定下来，也得益于乔秘书长，他大约一个多月之前就给我发了微信，我们俩个通了几次电话，研究商定演讲的题目。本来我想讲保险监管这方面的事情，因为金融监管这段时间社会谈的比较多，一直以来也是金融业非常关注的重点，包括宏观审慎金融监管，微观审慎金融监管等。尤其是研究探讨如何把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有机结合起来有效发挥金融监管有效作用，实现从综合金融监管、机构监管到行为监管的有效过渡。本来我还设想讲一些城市灾害管理和保险方面的内容，这方面保险服务是短板，要加快步伐补齐短板。乔秘书长建议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再过十多天就要召开了，我们还是等到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新闻公报出来之后，结合会议的精神一起来讲讲最新的金融业、保险业的情况。我觉得这也挺好，乔秘书长政治意识、大局意识、金融意识非常强，我也非常尊重他的一些想法。

所以，今天的题目是关于“深化保险改革，维护金融安全，努力实现保险业治理现代化”。主要是讲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当前保险业的发展形势；第二是以深化保险业改革促进金融安全体系建设；第三是提升保险业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因为大家都知道，十八大以来，中央的各项改革主要是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展开的。我们保险业服务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于党的执政地

位的提高，要把我们的保险工作与党的中心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所以我讲这三方面的内容。

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就是1979年11月份，党的工作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险业恰恰在这时候得以恢复业务和快速发展。在座的徐文虎教授这方面是有发言权的，他很早就从事保险业发展这方面的研究，现在仍然担任复旦大学保险研究所所长，为保险业学术研究贡献了一生。在保险业接近四十年发展历程中，我的感觉是中国保险业实现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我们现在有不同口径的统计，有的说中国保险业现在是世界保险业第二位，也有的说是第三位，不管是第二位还是第三位，我们从无到有发展到现在，的确不容易。这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得益于党的工作中心的调整，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金融放在一个核心地位、血脉作用，金融业得到发展，行业规模之大，成长速度之快，可称之人类发展之最。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走过了西方好多国家保险业300多年所走过的路程。比如说日本保险业历史接近350年的历史，规模在世界位于前三位。中国现在保险业的总规模实际上已和日本的市场规模大体相当。这些成绩的取得如果没有党的英明决策，没有改革开放大环境，就不会有中国保险业发展的今天。

我们上海也是一样，20年前上海的保费规模还不到100亿。当时上海保监局成立的时候，我们提出要在三到五年之内超过350亿。当时很多记者抱着怀疑的态度，同时也有殷切的希望，都希望我们能够发展起来。实际上的结果呢，五年之后远远超过了，达到500亿-600亿的规模。得益于什么呢？得益于上海市委市政府，得益于我们保险业界的共同

努力。从全国来讲，上海金融业、保险业在推动改革创新，支持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于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我们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防范金融风险、提供保险保障方面，工作成绩是有目共睹，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现在进入了十三五的第二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考虑保险业如何发展？我们有这样一个预计，到 2020 年的时候，中国保险业的人均保费全国要达到 3500 元人民币，总保费规模占 GDP 的 5% 以上，这是全国平均水平。当然上海现在远远超过这个，都接近人均 7000 元了，非常难得。

在这个过程中，保险在经济发展中的保障作用会大幅提升，只要有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都有保险存在其中发挥作用。刚才王会长讲到韩书记到印度参访，感受很深的是看到一个汽车碰撞事件，两辆汽车碰撞，双方司机握手后各走各的，开到自己的 4S 店去处理这些事情，各自找各自的保险公司，完全由保险公司来负责。现在实际上我们车辆的保险基本已经解决了，现在承保的车辆超过 1.4 亿辆。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是应保尽保了。涉及到一些公共安全，车辆碰撞，人身伤残死亡，都可以得到解决。我们保险业在下一步的发展中，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将来会越来越多。

十三五期间，保险业可能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对我们上海市的保险业来讲，也是创造了一个更好的发展机遇。为什么呢？因为刚才和几位专家交流的时候，谈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这方面的议题，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有更高的水平，努力把上海建设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创造很多有利的经验，服务国家发展，这是长远发展的重要举措。所以，我们要深入地学习，全面把握中央对金融工作的基本要求、

政策措施、主要原则和重要任务。大家知道，前不久习总书记参加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会议上他作了重要的讲话。我学习领会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他指出金融是国之重器。实际上给我们金融保险业压的任务是不轻的。所以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对金融业要求，我的感觉是：只能做好，不能做差。这个重器出了问题，那就不得了，可能会出现影响国家安全问题。所以习总书记特别强调了，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习总书记把金融安全提到这么高的位置上来看，大家要理解这个深刻的含义啊。

今年5月份在清华大学的一个国际金融研讨会上，我讲了关于养老保险的问题。讲完之后，人民网、新华网、腾讯网、凤凰卫视四家说一定要采访我。推辞不掉，在他们的采访中，记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金融安全问题，问我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金融安全，国家认为如此之重要，是一个战略的抉择。周小川行长在陆家嘴论坛讲，金融要处理不好，是要出大事情的。这个大事情是什么事情？什么事情算大事情？犯战略性的错误是大事情，其他都是小事情。这是一个战略决策，金融安全问题一定要高度重视。因为现在是经济的金融化，或金融化的经济，无论是怎么讲，金融在经济的地位是一个血脉，是一个核心，处于国之重器这样一个位置上，处理不好，真的要出大事情。

前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第一次是1997年11月份召开的，一直到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本人是全程参加的。这是第五次，因为我已退出了领导岗位，就没有参加。但是这次参加的人，行政级别是非常高的，总书记是首次去参加这样一个会议，提出了这样一些具体的要求。他当时提

出了三项任务，四个原则。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把握这些要点，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习总书记对金融工作会议所提出的这些要求上来，这是非常重要而紧迫的一项任务。大家一定要深刻领会，学习好，运用到工作当中去。习总书记因为站的高，看的远，讲的是大的原则问题，是主要的方向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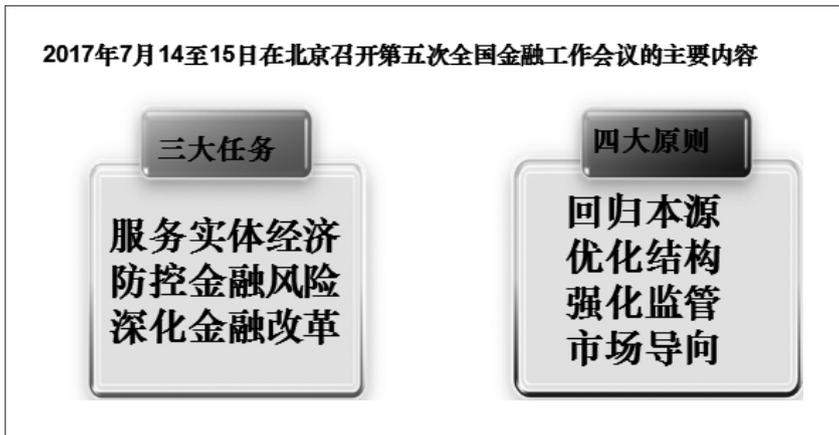


图 1：党中央国务院对保险业发展的战略部署

我今天和大家交流的内容，主要围绕学习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学习总书记的讲话来展开的。党中央、国务院对保险业发展在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做出了战略部署并提出了具体要求，因为保险业是金融业银证保三驾马车之一。习总书记提出的三大任务，第一个是要求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什么算实体经济？什么算虚拟经济？可能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什么是经济的金融化，什么是金融的经济化，大家可能也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分析判断。现在讲到金融是属于虚拟经济的，不错，还有什么算虚拟的？大家也都可以根据经济结构和产业政策来分析。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也没

有一个固定的划分。在服务实体经济的时候，一定把握好经济结构，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重点服务好“三去一降一补”这些行业和领域。总体要求是，现在国家要实施“三去”的产业，金融服务就不要参与了；“一降”金融活动也少参与了；但是“一补”的领域，金融服务要多做些这方面工作，多下些功夫补上短板。

防控金融风险是第二个重大任务。刚才讲到，金融安全问题是一个战略抉择，不是开玩笑的。大家回顾一下 1998 年的亚太金融危机，很多银行证券保险机构都垮台了，包括在泰国、马来西亚、韩国、日本的，海外的机构网点都撤退了。这一活生生教训是很惨重的啊，你说防风险重要不重要啊？的确重要！金融风险有一个特点，爆发有突然性，有系统性，影响之广和突然性是超出大家意料的。美国 2008 年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阴魂未散，后果无穷美国执政当局反思认为，次贷危机与政府采取的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有关。政府想把这个事情做好，让每个人都住上好房子。但是房利美和房地美以及商业银行提供的信贷太大，给每一个购房者有收入的人超出 10 倍 -15 倍的贷款，他能还的起吗？房价高带来的是表面上个人资产有了很大的增长，但资产的泡沫非常巨大。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社会总财富缩水了 2.5 万亿美元。美国人不反思这个问题吗？你看这几年美国谈到金融危机的时候，他们仍然心有余悸。美国的学界、政界讨论危机过后的教训的非常之多，检讨这次金融危机造成的危害及教训，对美国政治、经济、社会、人的心理的影响不可低估。所以，金融风险要高度警惕，影响范围如此之大，时间拖的如此之久，可以看出，一旦金融安全出了事情就是大事情啊，社会、经济发展一下

子拖后很多年，长期低速增长，长时期维持低利率水平，收入上不来。美国的失业率曾达到百分之十几，现在降到百分之四点几，但是收入没有上去啊。有时候中国人在美国花钱的时候，美国人看着心里很不是滋味。你看，中国人到沃伦斯基西牛排馆，非常高档的，去了之后，什么好要什么，吃的哈哈大笑，喝的红酒是最高级的。美国人看到心里很不是滋味很难受，怎么能是这个样子？中国人突然发展起来了，他们心理也不舒服。但是要看到风险在你这里要发生了，资金链在你这里断裂了，你自己倒霉了，也没有办法应对，这是最可怕的啊！

因此，面对经济金融风险，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高度重视，所以习总书记提出第二条任务就是防控金融风险，是有战略思考的啊。要解决风险防范不适应的机制问题、体制问题还要深化金融改革。现在有很多金融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对银行业反映比较多的，是贷款难，贷款贵。到银行借不到钱，只能去民间金融机构借高利贷，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就形成一系列的金融风险。这样的金融活动方或不改革不行。银行信贷主要是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银行业现在总资产也不小了，250万亿了。老百姓怎么还借不到钱呢？现在情况是体内循环，理财产品，表外资产，全都是在体内形成一个资产泡沫，这样的金融交易模式时间长了是不行的，真正出了事情是毁灭性的，等到那时候，多少个银行、金融机构倒闭也填不了这个大窟窿。所以大家一定要高度警惕，一定要深化金融改革。金融改革改什么呢？改革原来的货币政策，从宏观金融和财政政策的角度来思考如何改的问题，从微观的金融交易、金融操作、信用风险、信用甄别，要做信用体系的改革。这段时间大家看到，信用体制改革强调的

非常多，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一些金融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是非常大的，决不能小觑。

首先，金融改革一要回归本源。银行是做信贷的，你就做好信贷服务，创造货币信用，服务于实体经济。资本市场的，你就提高直接融资能力，服务好实体经济，服务企业的发展，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形成现代化的公司治理结构。保险业的，你要提供风险保障和风险管理，不要荒了自己的地，种了别人的田。习总书记对于保险业定位很清楚，就是回归你的本源，做好风险管理与保障。前一段时间保险的乱象、银行的乱象、资本市场的乱象，大家看的很清楚。所以4月25号习总书记在政治局研究金融工作的时候提出来，要求金融业强监管，治乱象，防风险，补短板。为什么要这样？因为现实中活生生的例子很多，不能让这些情况再延续下去，否则风险是非常巨大的。

二要优化结构。现在的金融结构，别的不说，保险业保障性的产品占比不到5%，90%以上都是一些理财产品，这种结构完全偏离了本源。自己没有干本行，而是干副业，副业带来的一些乱象风险影响国家的经济结构，带来的问题是非常多的，行业的形象也受损。

第三，要强化监管，要补监管这个短板。原来监管主要是管机构审批，管产品审批，现在要回过头来，要管违法违规行为，要快刀斩乱麻。不论银行也好，还是保险也好，形成了金融体内循环，带来了很大风险，这个要重点治理。原来有一段时间，内保外贷，短钱长做，长线短做，资产负债不匹配的金融交易，形成很多的风险，这些我们都要果断地治理，真正达到负债和资产的有效匹配，解决好这些问题，切实防范风险的隐患。

第四，要坚持市场导向。市场能够做的事尽量让市场做。各自干好各自的本行，使我们能够可持续地推行下去。这三大任务，四大原则，是这次金融工作会议的核心内容。

要做好这些工作，对保险业来讲，要实现四个方面的提升。第一，保险业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怎么样实现跨越式发展呢？在哪些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带来哪些贡献？做好风险保障是首要，提供有效的解决风险的方案是重中之重，这是我们各项保险工作要考虑的重点。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保险业主要任务是提供保障和风险管理，你就做这两件事，其他的事情不是你的职责。保险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保险服务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方面如何做，怎么做？现在国家对于保险业的要求：要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养老保险、健康保险，需要保险发挥作用。要解决养老保险体制改革中商业保险缺位问题。要为农民生产生活的保障提供安全网的问题。这些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风险管理工具，保险业要拿出解决方案来，包括现在脱贫攻坚的问题，这都是保险业要发挥作用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非常重要、非常紧迫的任务。

另外，保险要服务于实体经济，保险的一个轮子是做好风险保障，另外一个轮子是要运用好资金。如果保险公司把10多万亿资金运用好，对国家实体经济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也好，信贷的间接融资也好，都可以看到现在做得很不够。不够怎么办？这次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调整，保险业也一样。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要着重于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经济发展健康可持续，提高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保险业要发挥作用，提供风险管

理的方案。

对于保险监管，现在不但要强调宏观审慎监管，同时还要强调微观审慎监管。从市场准入、市场行为、产品结构、服务的式，都要进行监管方式的完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对这种乱象快刀斩乱麻，该治理一定要治理，否则将来的风险是非常大的。这段时间大家可以看，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都做了一些工作。保险监管，金融监管。一要坚持依法监管、二要科学监管。现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各种技术广泛应用的今天，科学监管是非常重要的。三要有有效监管，我们做没做事情？也真做了，但是效果不明显。有时候监管不是没有抓这些工作，而是监管这把刀没有砍到它的痛处，效果不是太明显。有效监管就是像动手术一样，有肿瘤就把肿瘤拿掉，让它的病灶得到治愈，这样的效果就好了。所以我们监管一定要坚持依法监管，科学监管，有效监管，提高我们的监管能力和水平。

现在我们监管部门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对于资产评估，我们有一套监管体系，资产负债，偿付能力，监管模式，我们有很多指标体系，来进行分析判断。重点是要对风险进行预判，同时要进行分析，还要进行分析，要进行一些量化的研究，然后得出结论，采取什么方式解决保险监管的短板问题。不是说我们以前的监管过程中，所有的法规制度都没有用，而是这些制度、法规、方式方法需要调整，要使监管真正看到一些效果。这样才能抑制风险突然迸发的问题。我们现在风险隐患呢，也确实是不小。这段时间可以看到，一旦我们实施严格的监管，问题就暴露出来了。隐患是有的，病灶也是存在的，我们怎么监管来解决这些问题？

对保险业来讲，我们要做刚才这些工作，我想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应对系统性风险的挑战。经济运行中，主要有什么问题？对保险这个行业主要有什么影响？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一定要抓得准，抓得住。现在保险业有产品结构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不可持续。我举个例子，短期资金长期运用，一旦现金流断裂，系统性风险就出现了，风险是很大的。即使把巨大的资产放到里面去，都填不满这个窟窿。不但是我们，美国很多好的金融机构都破产了，来堵这个窟窿，现在还缺不少呢。所以，系统性风险要高度重视。

还有就是保险业的供给能力不足。其实保险业的产品不少，但有几个是老百姓适销对路的？不多，甚至研究的也不多。比如讲到海运保险问题，一些我们认为好东西，但在推出设计，甚至作为一个政策出来，遇到重重阻力啊，不是那么容易推动的。这些实际上都对监管、对政策调整提出新要求。现在我们的很多产品为什么受老百姓欢迎？老百姓关注的都是一些短期效益，只要是这个产品收益高，不问你保障程度怎么样，这个就不是保险了，变成投资了。保险是风险保障，不是投资。你一旦把保险产品变成一个投资产品，就偏离它的本源了，这是不行的。

科技发展给保险业带来新的挑战，对大数据，你如何分析把握？我记得多年前在上海搞健康保险的时候，原来准备搞大病保险，搞健康保险，发病率数据到哪个部门去弄？医管局也好，卫生局也好，都不给我们，我们就不知道老百姓得哪些病。如果有大数据的统计，我们就能有针对性地开发一些产品。过去，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效果也不好，设计的产品老百姓觉得没什么用，因为你不掌握这个数据。

现在我们有了互联网，科技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带来如何监管问题。比如说，区块链技术对信用体系建设也好，对信用保障也好，是非常有利的。我们怎么监管，做好了没有？监管部门了解这个技术没有？都给我们提出了新要求，都是对保险业监管提出的一些新要求。

另一个方面，就是保险业对外开放的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大家可以回想保险业的发展，我们上海在全国是率先开放的，1992年9月28号，AIG在上海建立第一家外资公司，随后我们这个市场逐步发展起来。我们国家保险业接近40年走过的路程，都是改革开放促发展的结果，开放带来高水平的发展。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对外开放能不能坚持我们原有的思维方式，原有的做法？我想我们要做一下调整，政策上也做一下调整，甚至地方管理也都要做一些调整，包括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都要做一下调整。不然的话，可能过一段时间，这个地区就成为大家遗忘的角落而开始衰落，这是很可怕的。国务院非常明确，政府要做好服务，该放的放，该管的管，一定要管理好，从服务的角度要管理好。自贸区建设，目的是为了提开改革开改的水平，但我们的思想是否能转移过来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第二个大问题是深化保险业改革促进金融安全体系建设。这涉及到风险管理、风险保障，我为什么讲这八个字呢？因为这是中央提出的要求，不是我们自己想象的。这实际上也有我们的保险文化特点，有时候我们讲“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实际上这都是保险的功能，要做好风险管理，就要做好保障。保险是吸收风险和管理风险的特殊行业，我们必须有效履行风险管理职能，不能偏离这个职能。一旦偏离这个职能，我们保险就离开了本源。要加强对

自身的风险管控，绝不能让风险的管理者异化为风险的制造者。这个话讲的稍微偏激了一点，但现在看来，这段时间确实是有保险公司变成了风险制造者，给社会提出了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大家看得出来，公开媒体都有。所以风险管理者一定要理解这个政策，千万不能当风险制造者。我们保险业要把控制风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入治理市场乱象，果断处置潜在的风险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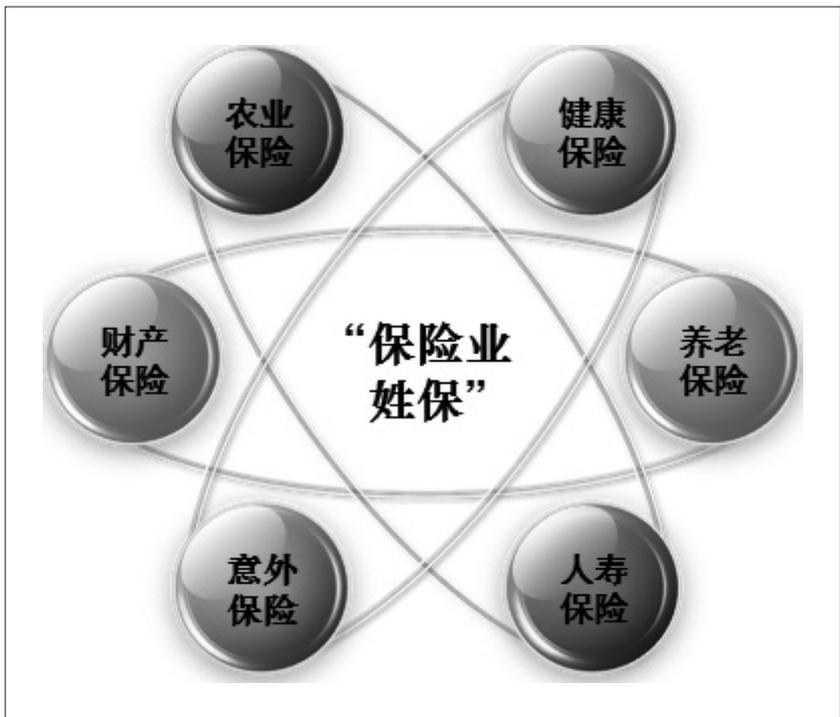


图 2：保险保障功能

要完善防控体系的长效机制，我所强调的不是机制，而是长效这两个字。很多风险的形成不是一天两天，是有一个过程的，也有体制方面的原因。处理一定要及时果断。我们

要切实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注意两方面问题，第一是要防止黑天鹅事件突然发生，第二是要防止灰犀牛的风险长期存在。时间关系，不展开讲了。保障功能从这几个方面体现，第一，农业保险；第二，健康保险；第三，财产保险；第四，养老保险；第五，意外保险；第六，人寿保险。现在我们建立养老保险社会保障体系是当务之急，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支柱、第二支柱，相对来说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但有资金的压力，且保障相对比较低。第三支柱，商业保险比较弱。政策上虽然有原则性的支持，但发挥的作用不明显。我不知道上海的退休工资平均水平，我估计是六千多吧，同志们，要是按照这个替代率，退休之后马上变成了一个贫下中农了。这个水平不行啊，我们要鼓励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商业养老保险，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问题。现在替代率 40% 多，换句话说，我原来每个月工资 1 万多块钱，现在只能有五千块钱在兜里，我心里能够踏实吗？老人一旦退休，收入马上下来，向儿女要钱，可以吗？短期可以，长期不行。有时候我们讲，到一定年龄，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自己买商业保险、养老保险，替代率可以大幅度提高，这样自己心里才踏实。现在我们 60 岁以上的老人，到去年年底统计，是 2.24 亿，到 2020 年的时候大约 2.5 亿，到 2030 年接近 3 亿。在这种快速发展的时候，怎么做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发挥养老保险的作用是当务之急。

大家都知道，到了一定的时候，支出最大的，房子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千万不能得病，得病不得了，动一次手术，五六万是小数，十万八万是常数，三十万也不是偶然数。怎么办？保险一定要买足，应对不可以预见的疾病，都是非常必要的。举两个例子。刚才我们聊天说到百岁不是梦，现在

有很多养老设计，我们实现 120 岁的梦想，社会保障缺口还会越来越大。所以我在清华大学金融论坛上讲了，我说要研究对第四支柱的的支撑，社保资金的支出现在在两万多亿，要加大这方面的储备。我认为这种储备的定位属于战略性储备，人的长寿风险的储备。最大的风险就是保险业的三个风险，第一，偿付能力不足的风险；第二，资产负债不匹配的风险；第三个就是长寿风险。

我简单说一说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我们大概有接近 6 万亿的总规模，分布在像绿色金融、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还有京津冀协调发展，还有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还有棚户区改造等等。通过股权计划、资产支持计划，还有合作搞一些项目，以这些方式来支持。这个我不作为今天的重点，给大家把这个题目点到，因为不谈这一块资金运用就缺了一点东西，所以我给大家讲一讲。下一步我们要强化现代监管体系建设，强监管、治乱象、补短板、防风险，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最后一点，就是怎样提升保险业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现代化建设，这是一个核心内容，也是我们的主要内容、主攻方向。如果在这方面我们偏离了，那我们就偏离了国家对我们保险这个行业的要求。首先，保险要加强法制建设，我们出台了一些文件，“废改立”的相关工作，我们都做了一些，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第二，保险有效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习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要求，比如坚持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处理好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完善市场约束机制，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加强改善政府宏观调控，健全市场规则，强

化纪律约束。我想多讲一点，现在我们宏观调控比较有效，但是微观审慎这方面还有差距。我们要逆周期监管，手术动到哪里，哪里都感觉痛，下不了手。监管部门对被监管的对象，像管儿子的这种管法，容易出问题。大家有时候讲，谁的孩子谁抱走，但孩子抱走之后，到家里再给你喂奶，这种监管方式能行吗？我们现在提出调整监管规则，要针对一些问题治理，治理是会痛的，不是简单说说而已，要对一些行为进行纠正、调整。方向走歪了，要扶正过来了，要叫你走正路。这考验监管的力度，这样才能强化纪律约束。我在这里举个例子，我们服务社会治理创新，在宁波搞了一个试点，就是国家首个保险创新综合实验区，从哪几个方面呢？第一，优化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第二，强调多方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第三，以保险产品的创新，推动社会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第四，建立多元的纠纷和解决机制，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我们从综合创新来考虑，提高保险业在保障水平、风险管理、服务社会、创新发展这样的一种总体要求。

总之，我们要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三大任务、四项原则落实好，我相信在上海可以做出示范，谢谢大家。

乔依德：我们非常感谢周延礼先生给我们做了条理清楚的精彩演讲，下面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大家可以提一些问题。

张明海：我想问一下，刚才讲到现在保险业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大问题当然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为什么到今天才想到改？有什么特殊的背景？你讲了系统性的风险问题，前几天我刚刚参加过一个有关保险的讨论，也是介绍系统性风险，今天听了你的报告以后很受启发。你这里讲的

系统性风险是怎么定义法？是指保险业本身的系统性风险呢，还是金融整体的系统性风险？如果是更大范围的系统性风险，靠保险业能不能避免这种风险？

周延礼：问的很好。第一个问题我就简单说，重点讲第二个问题。有些问题发生，的确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自然的角度来讲，气候的变化，一年四季，大家随时都可以适应，不觉得有什么。温水煮青蛙，死掉的时候不觉得什么，死的时候像安乐死差不多。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一开始是温水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这是热的？温度你把握住了没有。这是关键。一开始比如说，咱们出现这种非法集资的风险，比如泛亚，当时大家说这有风险吗？泛亚创造那么多金融价值，支持那么多项目，形成那么大资金，交了那么多税，是灰犀牛啊。对风险的判断，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觉得什么，政策制订者也好，参与者也好，都不会讲。原因就是风险的识别，量化也好，定性分析也好，一早要有判断：这种东西就不能搞，不要为了眼前的既得利益，不考虑长远的利益。为什么现在特朗普把巴黎气候协议推翻了？对他的总统职位来说，现在要选票，现在不管气候，那是几代人以后的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将来整个海平面上升，北极的冰块全部化成汪洋大海的时候，再管就晚了，但和我没什么关系了。

第二个问题呢，美国次贷危机初期，他们没有觉得产业政策是一个问题，但是真正成了问题的时候，又没有办法解决，这就是系统性风险。再比如说，我们身边的事情，当时说需要把这个保险买多一点，把那个保险买多一点，我们会觉这个保险和我没有关系，那个保险和我没有关系，但是一旦出了事情，就没有解决方案了。不说系统性的，单说区域

性的，我们上海有一些事做得非常好，比如说，“12·31 上海外滩踩踏事件”，通过社区综合险，一个市场化机制，一下子摆平了，老百姓高兴，社会也高兴。如果这个事情没有一个解决方案，老百姓为了损失，为了人身伤亡，全部到人民广场静坐，你想这种社会损失会有多大？所以我们保险对于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可以有效发挥作用，在这些微小之处都可以体现出来。当然大的方面，比如农业和养老产业，实际上都是服务于国家的。简而言之，在解决系统性风险，从风险的识别，到风险的解决方案，这整套的过程中，把保险纳入进来作为一个政策支撑体系，是非常必要的。谢谢。

谈佳隆：我想问一个关于养老的问题。刚才你也提到了，社保基金现在存在空帐，包括收不抵支的问题。未来劳动力人口越来越少，寿命越来越长，这个怎么办？你刚才提到商业养老保险这一块。我们看到，保险业的投资回报率其实是低于 GDP 增长率，也低于 M2 增长率的。未来参与商业保险的动力，未来的购买力，会不会不足？谢谢。

周延礼：你讲的这个是一个大问题，我们行业和决策层是一定要关注的。好在前不久，6 月份的时候，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的若干意见》，这可能和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呼吁有很大的关系。商业健康保险讲了很长时间，有十多年。很多政策十多年前我们提出来，到现在迟迟没有落地，原因在哪里？大家对这个问题没有一个长远的考虑，这个是很可怕的，不怕你看不到风险，怕的是你对风险视而不见。我们就说，现在遇到这些问题，将来有没有一个解决办法？作为国家的决策者，甚至我们社会的参与者，一定要有一个齐心协力、上下一致、共同参的一个方案，这

样才能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前一段时间，有一些研究部门提出我们有几万亿储备，政策制订者不觉得是问题，说我们现在结余很多，问题是这样吗？我觉得这都是一些问题，我们要考虑。我们不想走回头路，习总书记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所以我们现在要用现代国家治理的知识、能力，发挥我们中华智慧，提高我们服务国家的能力，利用保险这种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关键是在制订政策上，比如说在企业年金等方面，加大力度，为全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把这些资金能够平滑到长期可持续的水平。我相信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我们保险支撑可以体现出来。

杨邵波：我是一家智库的。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现在有监管，有创新，现在怎么把握监管与创新这方面的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怎么同步三个行业？从上海的角度来讲，如果金融保险证券的综合性监管在上海自贸区可以试点，上海怎么做？

周延礼：第一个问题，从你智库研究的身份，可以作为深入思考研究的一个课题。因为这实际上涉及到一些金融政策的问题，也涉及到一些产业政策的问题。你们智库关心这个问题，我想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做好政策长远性的思考；第二，现实政策的研究；第三，政策建议的提出。你可以大胆思考，以智库的身份提出来，我想我就给你提这些建议。

第二是关于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问题。具体的职责，国家可能将来还会有一些具体的明确。对于上海来讲，将来根据情况，我们要落实中央的一些具体要求，做好管理，上下一致，服务于金融业，强监管，防风险。如何把

握这个度，是一个难点，特别是创新和监管这方面。前一段时间，媒体也有这方面的说法，要防范“处置风险的风险”，这就是一个度。监管和被监管之间，都有一个利益博弈，博弈的要点就是互利共赢，不能互输，怎么能够保持有效监管，怎么做到既科学又有效。所以我说，你作为智库，可以在这方面多研究，做长远研究，做现实研究，政策建议都可以提出来。

乔依德：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周延礼先生的精彩演讲，也感谢大家在那么热的天参加我们的活动，今天沙龙到此结束。



互联网基础设施业务的性质和影响

系列座谈会 2017 年第 4 期

2017 年 7 月 31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么热的天赶过来参加这个会。起因在发给大家的通知当中也讲到，朋友圈有一篇微信文章“秦朔：当阿里和腾讯成为一种基础设施，它们会通往哪里？”，这篇文章还是有一些反响的，提出了如何看待“互联网基础设施公司”的重要命题。我看了以后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探讨。我们基金会是非政府、非营利机构，不单单是解释政府的政策，也前瞻性地研究一些问题。所以我跟秦朔打了电话，他也觉得可以小范围、非公开地开一次会。所以今天召开“互联网基础设施业务的性质和影响”研讨会。首先还是请秦朔把主要观点讲一下。

我们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讨论。第一，是否可以或者如何将互联网基础设施公司与一般的基础设施公司（电力、水）进行比较？如何比较？第二，目前互联网基础设施公司的支配地位、垄断地位对经济、社会到底有什么正面或可能的负面影响？第三，如果有负面影响，我们从政策角度怎么引导和规范这类影响。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要讨论等一会也可以提出来。下面我们就请秦朔给我们做一个引导性发言。

秦朔（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谢谢老乔！我写那篇文章的初衷跟我离开“一财”以后慢慢形成的思考方式有关联，我认为政府、企业与市场，

跟社会的力量（国外主要是宗教、大学、知识分子、媒体）应该有一个均衡，任何一种力量过于强大都会失衡。没有舆论监督问题就比较大，好像谁都说不行，谁都不能说。所以我这两年写了一些批评大公司和富豪的文章。

关于阿里和腾讯作为一种基础设施的问题，先讲一下自己的理解。

第一，从企业的角度。提出 BAT（B= 百度、A= 阿里巴巴、T= 腾讯）概念大概有了七八年了，但现在已经是 AT 独大，。他们提出的平台基础设施已经建成了，最早的 QQ 跟现在的微信相比，微信是一个非常大的超级平台，承载的功能远远强于以前，把金融、日常生活全都并在一起。原来是“互联网应用”，现在已经变成了“日常生活”，绝大部分政府部门、企业部门也以这个为平台。AT 的平台功能比当年提 BAT 概念的时候强很多。它们还可以借助强大的低成本资金进行并购，这跟当年相比也强大了非常多。就是所谓“站队”问题。它们已经类似于水、电等基础设施型公司。中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走在世界前面的“超级企业”。

第二，从行业生态角度。现在是以互联网+、AT+ 为主导的。最近有一篇文章“人民想念周鸿祎”，为什么怀念周鸿祎呢？因为当年“3Q 大战”（奇虎 360 与腾讯 QQ 之争），360 与腾讯打了长时间的官司。文章说，现在 AT 膝下儿孙满堂，很多独角兽（指估值超过十亿美元的创业公司）都在 AT 底下。中国有《反垄断法》，但基本上是对想收购中国公司的外资企业用的比较多，对内资企业是用的比较少。比如阿里收购大麦网，在单一市场的比例已经超过《反垄断法》的规定，但也没有进行过审核。《反垄断法》是 2008 年的，现在已经 10 年了，但应用得很少。对照 Facebook、谷歌、

亚马逊这些公司，它们也很强大，在硅谷里也有主导地位，但没有像通过投资、模仿、扼杀竞争者来保持其地位的文化。在美国，最有钱的科技公司会受到很多限制，从最早的《谢尔曼法》到后面的《克莱顿法》，对反垄断和知识产权保护有很强的意识。比如说《克莱顿法》，一个公司从另一个企业获得一定的收入后，要禁止它跟该企业的直接竞争对手发生联系，对支配性公司的限制比我们多得多，不论是谷歌还是微软都被起诉过，而且起诉的时间很长。

但在中国，大公司好像受到了一种特殊的保护，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复杂的原因，但是行业里意见、议论很多。

第三，从政府的角度。我之前看了一些资料，政府对互联网的发展总体上是支持的，鼓励“双创”、“小微创业”、“分享经济”，李克强7月提到，对于新业态、新模式要审慎，审慎出台新的准入和监管政策，“要相信，中国人有聪明才智创造出这么多分享经济的新模式，我们也有能力探索出包容审慎监管和社会共治模式，释放中国经济巨大的潜力。”而且他举了腾讯微信的例子，如果没有微信，今天的社会生活和生产不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是领导层的主导倾向。

在这一大的倾向下，有些部门说是在管，但事实上不怎么管。像电商平台假货的问题、税务的问题、产品来源地的问题，这些年监管部门作为比较少。2010年国家工商总局关于网络交易的文件肯定了自然人若如实申报身份是可以开网店的，开到一定规模要在工商注册，大大鼓励了电商的发展。我看了文件，文件对经营者、服务者（平台）有非常多的限制，看起来很均衡。但在实际运用过程当中，限制性、约束性都很少。

还有避风港原则，源于 90 年代末的数字版权制度，“数字千年版权法”降低了在互联网平台分发产品和服务的责任，所以电商公司认为，上面卖假货跟我们关系不大。但从欧美来讲，避风港原则的应用越来越谨慎了。中国也有判例，如果发现电商平台上假货，我投诉了，拿到了确定的证据，平台方需要快速处置，如果知假还卖假，那平台也有责任。但总体上，判例还比较少。

最近我感觉情况在细微地发生变化。首先是习大大在网络座谈会上很明确地说了“办网站的不能一味追求点击率，开网店的要防范假冒伪劣，做社交平台的不能成为谣言扩散器，做搜索的不能仅以给钱的多少作为排位的标准。”

再比如说央行今年的支付新规，对于第三方支付机构交易过程中产生的客户备付金归央行监管，支付机构不得挪用、占用客户备付金。目前的做法对它们的影响不是那么大，因为涉及到余额宝这一类的叫理财基金，不算备付金。同时我们看到，央行体系里对于金融数据垄断的意见非常大，有意见认为未来技术垄断比数据垄断更可怕。

现在网信办牵头搞互联网产品隐私保护的措施，最新的是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国家发改委搞了“个人信息保护提升行动”，选了 10 个互联网产品，微信、微博、淘宝、京东商城、支付宝、高德地图、百度地图、滴滴、航旅纵横、携程网，要明确了解“形成用户画像的目的是否用于推送商业广告”，了解是否明确告知用户“访问、删除、更正其个人信息的权力，实现方式、信任条件”等。

这是从企业、行业、政府三方面，谈总的看法。

现在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呢？

站在阿里跟腾讯的立场，对我写这篇文章比较大的意见

就是，中国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相比在美国的企业，比如我文章中举到的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受到的压力大很多。美国政府起诉洛克菲勒的事情打了 20 年的官司。而如果一个中国企业出了问题，它如何用正当的方法为自己辩护呢？比如民企对外投资，可能有非理性因素，但当时全是政府批的，鼓励的。企业现在出了问题后，不能说任何话，媒体只能是一个声音。这对企业就不公平。

从我作为独立研究者的立场，我觉得政府的权力有时是滥用的，企业也存在着霸权。都需要提醒。

左学金（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秦朔考虑的很多问题都是有预见性的，很多是我们从法律上、社会舆论方面都要特别关注的事情。我提几点。

第一，互联网公司扩张的边际成本很低，这和传统的基础设施如电网和供水系统不一样，所以互联网公司更容易扩大。

第二，互联网公司技术变化很快，比供水、供电的技术变化要快得多。比如说腾讯的 QQ 就是被自己的微信打掉的，很难预料未来会有什么把微信打掉。这就跟传统的基础设施公司（供电、供水）是不一样的。

第三，供水很难细分市场，最多是把饮用水和冲马桶水分开，但你很难对张家供 A 级水，对李家供 B 级水。现在有互联网有公有云、私有云，私有云收费很贵。很多金融企业不愿意把自己的数据给像阿里这样的公有云，所以花钱用私有云，私有云承诺保证数据不泄露。公有云不收钱或收钱很少，但是它的收入是从数据来的，它大量用你的数据。

互联网公司更多的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寡头（Oligopoly），即几家公司主导市场，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垄

断（Monopoly）。我们现在说的支配企业也常常是指寡头，如说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移动终端两者加起来可能占 80% 多，垄断的程度很高，但不是一家，是两家。

如果要分析互联网作为基础设施与传统传统基础设施的区别，我粗略想了一下，大概是以上三点。

乔依德：从学术上归纳的这几条还是很好的。

左学金：也要讲一下互联网公司的正面影响，然后讲负面影响。我觉得互联网公司对某些行业内原有垄断有一定的冲击，如金融原来是几大行，电信行业由中国电信与中国移动等少数公司在垄断，但由于阿里移动支付，由于腾讯的移动支付，由于微信可以免费输送文字、图象和声音，所以对原来的金融电信垄断是有一定冲击的。原来金融电信是稳赚的，稳赚不是因为它们有特别的技术或竞争力，而是因为它们有定价权。但由于阿里和腾讯的冲击，现在不是保赚不赔了。我听说现在银行的柜台交易业务只剩下 10% 了，90% 已经被线上交易等其他交易方式取代了。对原有的垄断形成冲击是好的。

第二，降低成本，提升消费者福利，推动技术更新。我们的移动支付在全球是最大的市场，技术也是比较领先的。如果我们限制它发展，可能也没现在发展的局面。比如说滴滴打车原来是可以做得更大的，但我们把滴滴公司管死了，服务的车辆少了，现在高峰时段用车可能需要加钱才能要到车。这不是技术本身，是我们管理的问题。我觉得要考虑互联网公司的反垄断问题，但不止互联网，对于国内其他公司也要真正重视《反垄断法》的实施，要有比较专门的机构，比较严格的程序。

第三，要切实保护知识产权，对大企业模仿中小企业的

原创技术进行限制。美国大企业花巨额资金收购中小企业的技术，我们的一些大企业是简单拿来用。

第四，保护隐私，保护消费者利益。美国是从宪法或规章的角度来讨论，美国的出发点是保护消费者。我们往往保护的是企业而不是消费者，这是很大的问题。

另外，我们要求互联网大公司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为你的产品或服务带有基础设施的性质，带有一定的公益性。如百度这样的搜索引擎就应该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对它的排名应该有比较严格的政府监管，不能因为一家企业的商业利益浪费用户时间，甚至误导用户，造成病人负债与死亡。归根到底的问题就是，权利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如何真正做到这一点，是互联网监管的深层次问题。

乔依德：左学金做了很好的发言，学术上有概括。下面大家也开始说吧。

高峰（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秦老师的文章刚出来的时候我看了两次。

秦朔：就是提出了问题没有结论

费方域（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你能把问题提出来吗？我没有看到过你的文章。能从三个方面归纳一下问题吗？从学术上来说是什么问题？从政策层面上是什么问题，从总体的博弈格局来说是什么问题？我没看过，听了一遍以后模模糊糊地有点感觉，但你让我明确地说是什么问题我也说不出来。

秦朔：就是支配性地位。当基于互联网背景的公司成为外部性空前强大的公司的时候。

费方域：控制力很大的公司。

秦朔：跟一般的不一样，外部性太大了，几亿人天天使

用。用户如此之大的时候你的支配性地位会不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可能是垄断的问题，有可能是损害公民竞争秩序的问题，有可能是对消费者权益的问题，有可能是对行业的问题。

高峰：我觉得秦老师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传统的所谓的垄断性，比如说下水管道，比如说电力，你铺了一条电以后基本上就这一条了，所以你的垄断性在市场上很容易确定。秦老师提出的问题是：现在的互联网公司通过规模已经在市场达到这样的地位了，但是你不能定义它是这个垄断地位。不是说互联网不能来做垄断，但是不是在传统上的意义上。这是一个互联网带来的新问题，在传统上垄断或者新的东西怎么定义？比如说公路、电力这些东西定义了以后就可以界定，你有公用事业部分，所以你必须要在价钱上要考虑公共利益。现在他说你达到了这个程度，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完全地从传统意义上来确定垄断的节点，你怎么来控制这件事情，我看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当时看完以后跟你有同样的感觉，提出了很好的问题，但是存在当中怎么界定的问题。

我是绝对的外行，跟经济没有关联的外行。我想技术的进步已经导致很多传统的界定是不是适应现在发展的问题。比方说互联网企业，现在它的反竞争跟传统的不一样，包括硅谷也有很多类似的，我没有办法跟你竞争，但我在你规模还很小的买来，让你自动消亡。中国滴滴和 Uber 的合并，以前商务部调查反垄断是 180 天，但这个已经调查了超过一年了。

乔依德：最近又有新的说法，还在继续，这件事没完，社会上有压力。

高峰：可以用一些很有意思的法律，表示新技术和旧法

律之间的不适应。比如说法律规定收购营利不超过 4 个亿的公司是不触发反垄断调查的，于是很多互联网公司在收入很小的情况下被收购，就大概率地避免了触发反垄断调查，当你触发的时候就晚了。这是现行法律跟新技术是不是匹配的一件事情。

第二，新的经济形态是不是必然造成垄断？西方也有这样的讨论，现在大的企业就是赢者通吃的情况。技术边际费用很小，你只要确定领先地位就可以了，这是新的技术形态。我觉得问题的源头很大程度在政府的态度上，政府的定位在哪，政府是维持市场公平秩序还是要兼顾很多别的目的，现在我们的政府既要培植本土的品牌，又要发展地方的经济，所以在公平性上就可能存在欠缺。

左学金：本土品牌也是挺复杂的，现在怎么定义呢

高峰：举个例子，当时百度让谷歌进来的话，百度就不是垄断地位了。

左学金：谷歌进来消费者福利就增加了。

高峰：这是个问题，所以是政府的定位决定着企业的定位，刚才我不认同马云跟你说的好像在中国做企业很苦逼一样，实际上如果他们攀附政府，是有实际好处的。

左学金：马云这样的企业不至于靠攀附政府

傅蔚冈（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他们还是靠市场支持。

高峰：在国外，根本的概念就是公平。包括你刚刚讲的谢尔曼法案的出发点也是公平，但在中国是没有的，我们似乎更习惯弱肉强食。”这是社会形态造成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解。

就说这几个层次，一个是旧的法律跟新的业态能不能

匹配？第二是这是否是新技术的必然结果？再往下追究政府也要考虑，以后这些企业控制的资源过大怎么办？比方说数据，当然是对政府开放的，如果对政府不开放他是继续不下去的。但是如果让他控制过度，他今天可以绑架老百姓和消费者，明天也可以绑架政府。

刘胜军（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这个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为什么说简单呢？中国是有反垄断法的，我们的反垄断法并没有根据行业、技术来区分，如果你是严格地按照法律定义来较真的话很多事情也可以。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所以在执行当中确实有很大的问题。具体秦朔提出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对BAT要分两个阶段来看，目前他们是向垄断法说不能的，是反抗垄断法的。比如说传统的电信、传统的银行原来的市场定位太强大了，靠小公司竞争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有了BAT完全可能在电信、金融的角度把口子给打开，现在还没做电信，但是已经对电信公司带来了影响，所以它们是积极的力量。

但面对的另外一面是当你已经拥有了么大的地位以后，企业都是被利润和资本驱动的，所以会本能地赖于政府。这种商业的行为从法律上来讲并不是无解，是可以解决的。为什么没有解决呢？关键的问题还是两个原因。第一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中国需要创新的力量来打破垄断。第二，我们的《反垄断法》已经出台十年了，目前发改委、商务部除了对付外企的垄断地位外，没有做过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滴滴的事情搞了一年多了，也没有结果。包括高铁，原来只能卖一种矿泉水，现在这种事情遍地都是。2015年京东向发改委投诉淘宝每年搞双十一，阿里威胁商家什么的，但是发改委没有反应。包括你刚刚说的百度滥用搜索，我们最后把它

变成了道德问题，其实法律是可以解决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不去做这件事情。我认为这本身不是技术性问题，不是说阿里和腾讯是新的业态，所以导致我们很头疼。如果法律上论证不清楚是不是垄断就另外看，但其实它是可以被论证清楚的，腾讯和阿里做的很多事情反垄断法都是可以适用的，关键是这些人做不做。如果你问普通的公众，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很大的问题。在美国大家对反垄断的意识都是根深蒂固的，大家认为反垄断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大法，但中国远远没有形成这样的社会共识。

左学金：我们可以讨论，如果你舆论、政府都不向反垄断这个方向引导，一般人可能不会太关注。如果你引导了就不一样，当年网景和微软打官司，一般的老百姓也不会想到微软将视窗与浏览器捆绑销售对我的利益有什么问题，但是网景打官司使微软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刘胜军：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因为中国不是法治社会，所以很多东西领导人一表态老百姓就到那边了。

高峰：还是政府的问题，政府让不让舆论表达引导？

刘胜军：我觉得现在像 BAT 确实有两面性。一方面实力很强，有很大的市场影响力；但另一方面他们确实随时担心政府一纸文书把他给杀死。央行本来说搞 8 家牌照，就是不给发牌照。马云认为政府是随时可以更改决定的，尤其是 P2P 出了事情以外，上层终于找到了反击 BAT 的理由。换句话说，中国的情况既不是法律思维，也不是逻辑思维，就是政治思维。

高峰：企业其实很悲哀的，一方面它们利用自己的地位限制竞争，但他们在自己受到损害的时候也没有工具能够自我保护，不像洛克菲勒当时被起诉的时候还可以挣扎二十

几年。

刘胜军：讲一个小段子，前两年在达沃斯论坛上，有一次张维迎和中国移动的总裁在一个圆桌论坛上。当时张维迎是讲垄断的危害，中国移动的总裁说张教授说的不对，中国最垄断的当属微信。当时大家对中国移动的人比较反感，微信怎么说也是市场创新。张维迎说你是行政垄断，我说的是市场行为的自然垄断，不一样的。我觉得现在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了，微信过去是个创新，现在有了垄断地位以后怎么对待它确实是个问题。

高峰：我现在更担心的是什么？以前媒体是可以作为第三方发声的，秦老师的文章出来以后我也看了也转了，但很多人熟视无睹。

刘胜军：举一个例子，我前一段时间写文章说媒体在骗局当中都是失职的，媒体真的发现不了吗？所以现在媒体集体被利益绑架了，这个社会是非常可怕的。

傅蔚冈：我是不是可以这么说，秦老师通过依赖于微信创业，一年内的阅读量就超过了传统纸媒几年的量？

我想从秦老师创业的例子来谈我的感受。最近几年来有几个朋友创业，都是和互联网相关。他们对 BAT 的感受和秦老师的相反，他们觉得这几大公司给他们创业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而不是所谓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以前做一个小公司要搞注册、支付、电商、数据服务这几个环节，成本非常高，但是现在这些问题已经非常简单了，甚至很多内容你只要创立一个微信公号就可以解决。

第一，注册。以前要先到 APP 上注册一下，我自己是很不喜欢这种方式，我不愿意重新搞一大堆账户。现在好了，微信账户、微博账户都可以直接登入很多 APP，这给

消费者和企业带来很多便利。

第二，支付。以前搞汇率要到各个地方跑，我们研究院要搞一个 POS 机非常麻烦，要让你填各种资料，现在你接入第三方支付非常简单。

第三，数据服务。我自己也搞了微信公众号，粉丝很少和秦老师根本没有办法比。但是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我的粉丝状况：排名第一的是来自哪个市哪个省，他们喜欢什么手机型号，是男是女……当然，我没法看出单个粉丝的情况，但是总体情况却是一目了然。现在微信给小企业提供了非常大的创业可能。

从以上三点来判断，那就是微信这个基础基础设施给我们的创业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用赋能来说也毫不为过。

至于说到反垄断，我的看法可能和在座的各位也有点不一致。尽管我们的三个反垄断机构——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并没有对互联网的垄断进行查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因为反垄断发生的民事争议是很多的，最高人民法院的《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人民法院每年都要受理和处理相关的民事诉讼，比如说著名的 3Q 大战就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宣判的。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并不存在着所谓的放任垄断，只是不存在着行政部门主导的反垄断。我们现在讲滴滴不要寄希望于让商务部来做，现在可以向法院起诉，就像美国司法部要做的事，司法部向法院提出诉讼，而不是说司法部处罚你。

我觉得中国做的舆论和讨论垄断问题，不能仅仅把目光聚焦在行政机关上，而是要看到真正在行政市场当中利益受损的一方向法院提出诉讼，法院也确实受理了很多案例，也处理了很多案子，只不过这些案子绝大多数都不是行政机

关主导。

高峰: 这个我打断一下，在美国来说牵涉到政府，政府认为社会公平受到损害的时候可以起诉。司法部提出起诉的是认为公共利益受损，但中国的检察院我没有听说做过这些事情，你刚刚讲的起诉是对的，是作为私人或者商业个体来说认为我的利益是受损而提出的。

左学金: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在美国一个小企业告微软是可以得到支持的，但在中国小企业投诉大企业成功的很小，导致最后很少有人会发起诉讼。有很大的成本，知道成功的概率很小。

高峰: 从法律层面来讲，BAT 的确提供了基础设施，但最后也应该有责任。举个例子来说，你如果到一个银行开户的话，你知道最后反洗钱这些事情的责任是由银行来负的。银行不能说在开户的时候没有审查清楚，以后对政府说反洗钱的责任都是客户来承担。

傅蔚冈: 现在第三方支付微信这些也在承担。回到垄断的问题，根据我的考察，当年洛克菲勒被拆分是因为其他的几个商人干不过他，所谓的当地州的意愿是代表那一堆人的利益，对老百姓和用户的利益是属于另外一个层面。在洛克菲勒成立的这些时候油价是大幅下跌的。

回到微软的例子上来。为什么现在微软的浏览器市场份额大幅度降低？因为市场上有提供更好的浏览器，其实 Netscape 浏览器并没有微软的 IE 好用。我们发现，现在 IE 的市场份额大幅度减少了，是微软不再捆绑了吗？显然不是。这个当时被称之为世纪审判的案例告诉我们，只有市场自发的技术创新才能导致优胜劣汰。微软当时是不可一世的，后来雅虎出现了，谷歌出来又把雅虎干掉了，现在

Facebook 又在大幅地占领谷歌的市场。尽管秦老师讲了腾讯好像无所不能，但我们发现腾讯很多事情也做不了，比如说他搞了电商根本卖不成，最后只有卖给了京东。

秦朔：这又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事实上 BAT 不可能无所不能，BAT 现在做的很多东西并不是很成功，它们现在还是在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能够做的好。

高峰：在硅谷不乏这种例子，很多买下来的都“死”掉了，变相的反竞争。

傅蔚冈：现在苹果的市场份额又逐步上升，为什么它做的比微软或者其他的好呢？

秦朔：当年洛克菲勒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关联定价的问题，因为它有最多的石油，所以我要求铁路公司给我最多的折扣。铁路公司原产地的油或者炼出来的油给我 20% 的折扣，在市场价格打的很乱的时候，铁路公司可能只能定价 1 块钱，我支持你 2 块钱定价，你给我多少折扣？当价格提高到 2 块钱，提升了你的收入，那么我所有的竞争对手在你这儿运油，你也要给我折扣，为什么？因为我帮你增加了收入。就算竞争对手挖出来的油比我成本更低，但你总要运，运输的环节就把你扼杀掉。所以中国现在就是这样的问题，新公司很难竞争，因为获户成本太高。

傅蔚冈：因为微信如日中天，很多人觉得社交软件是不是没有出头之日了？好像并不尽然。比如前几年出现的社交软件陌陌并未因为微信的流行而退出市场，今年以来其股价甚至屡屡创出新高。我觉得最为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通过市场细分，大家都能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

现在有一个问题“个人信息信息滥用”的问题，本来是用于 A 目的，但后来被用到 B 目的。比如说以前金融机构

里牌照最全的是中国平安，一个部门收集你的信息后，这个信息就被后台共享到各个部门，然后你就会收到各种信息。这是有争议的，但是不是只有政府管起来才是对的？

我还注意到这样一个现实，企业如果滥用你的信息，你可以从媒体或者政府投诉等方式对付它；但如果是政府机构内部在用你的信息，你很多时候就没有办法或者很难投诉。比如说像支付宝或者是像微信支付这两家公司后台操作人员看你数据的时候，它们内部的授权可能比其他政府机构更加严格。

高峰：这是对政府的绝对不信任，但我相信在中国老百姓里做调查的话，让你的个人信息给私人还是政府，中国老百姓肯定是选后者。

傅蔚冈：我来说个例子。我们现在同学聚会候，哪位找不到了就找在公安局工作的同学，很多时候他往系统里一输入身份证信息就能就给你查出来。就我个人而言，尽管支付宝、微信给我带来便利，但很多时候我宁愿多刷一道信用卡，这样你的信用就储存在几个机构的手里，而不必要都在一个机构的手里。

高峰：我宁可知道政府不会莫名其妙给我打电话、卖房子，别的信息出去了一天到晚就有人给我打电话要不要买房子。

傅蔚冈：现在绝大多数收到的电话，一般都是市场里的公司通过房产交易中心、医院等公立机构里泄露出来。真正的市场机构相反不会泄露，并且在内部有着各种各样的授权机制。很简答的道理，客人的数据是自己的竞争优势，公司有义务保护这些信息的安全。但如果你的信息被房产中心、医院拿去了，那么很大概率就会流失出去。

刘胜军: 那是腐败问题，可能把信息卖了。

傅蔚冈: 数据全在政府手里以后，道德风险可能会更高。

费方域: 我概括一下你刚才所说的，秦朔提了有些企业，这些企业的市场力量很大，影响力很大，支配力很大，控制力很大，它们又有外部性和公共性，对于这样的“庞然大物”，万一他们要做坏事或者已经出现问题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来制衡他。

秦朔: 不是说万一，而是说他们现在的行为已经对利益相关者产生很大的问题了。

费方域: 这是大的考虑，包括一部分国家的经济管理部门，平时考虑的问题也是这样的，甚至他们觉得这件事情怎么可以交给你呢？我信不过你，万一你出现了事情怎么办。

第一，它们提供了公共服务或者是基础建设服务，这个怎么定义？怎么算是公共服务机构或民营企业提供了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的性质怎么确定。什么样的范围算是公共服务的问题。

第二，垄断性质的问题。现在这种商业形态下的垄断和传统商业形态下的垄断有什么区别？比如说捆绑的问题，刚刚举了一些捆绑的例子，但互联网本身就是多边市场，在平台经济下、互联网经济下捆绑是常态，它是通过这里不赚钱那里赚钱的捆绑。

左学金: 美国是有例子的，可以捆绑，但你要允许人家一样来利用你的捆绑。美国电信拆分以后长途和地方电话是分开的，但是有一家长途电话公司 MTI 必须要接入地方电话网络，才能提供服务，所以它提出来地方的电话网络是基础设施，应该允许其他公司接入，大家共享。最后美国政府

支持它接入。所以在美国，捆绑是可以的，但是不能用自己的平台来造成一种垄断。这都是原则或精神。关键要按这个原则或精神去做，实际上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法律，但监管部门可能没有积极性去认真实施，所以出现执法不严或有法不依的现象。

费方域：你说的讲法是对的，我同意。现在我们来一个一个讨论，我们具体讲，比如说 T 和 A 这两个，它的主要形态一个是微信，一个是淘宝，在这上面哪一部分东西认定为公共服务，哪一部分是非公共服务，哪一部分是基础设施？哪一部分不是基础设施？

左学金：这个垄断带有一定基础设施性质。比如刚刚傅蔚冈说的年轻人可以利用平台创业。

费方域：比如说芝麻信用，如果这件事情作为征信，原来他准备拿牌照，如果拿到牌照做这件事就属于基础设施；如果没拿到牌照不属于征信，他做的是信用，这就不一定属于基础设施，是商业服务。

乔依德：我归纳一下老费的想法，垄断是应该讨论的，支付算不算金融方面的基础设施？这个问题大家还没有达成一致。

高峰：支付一定是基础设施，因为传统的支付是从银行到央行接口，你这一路都相当于被认可的。相当于政府开了一条路，你在路上开车是安全的。从央行的角度讲是基础设施的问题。

乔依德：从这个角度来讲，AT 有一部分业务是基础设施，但社交不一定是基础设施，比如 Facebook。

高峰：理论上的基础设施是很有意思的，界定支付宝功能的问题。理论上来讲我建了这个基础设施，每一笔交易都

要通过这个渠道走一遍，但是银行可以把这个事给简化了，今天可能你有支出，也会有收入，今天结束的时候我给你做总体净清算，净额通过银行走，这是银行的功能，问题是支付宝是不是银行？

乔依德：现在银行、支付宝我都在用，支付宝不过是一个通道，最后钱也是从银行划出来的。还有一种是把钱存在余额宝里，就不通过银行了。

高峰：以前只是做支付的时候每笔是不经手的，现在有银行沉淀的功能，最早支付宝是第三方支付？支付的话就没有沉淀的过程就直接过去了。

刘胜军：金融监管和支付是两个话题。

秦朔：按照阿里的定义，上市招股说明书里面就这么说了，要做商业基础设施的提供者，其业务主要包括支付平台、云计算、物流、零售平台等。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把把这个当成基础设施，你就只做基础设施好了。但他在基础设施之外通过投资和流量支持的方法又投资了大量的“车队”，比如“美团”和“饿了么”过路收的钱是不一样的，因为“饿了么”是我投的，这就等于在带有公共性的基础设施里天生就有筛选，所以现在创业者也要选，要做站在哪一边的损益分析。

理论上基础设施应该所有的服务带有公共性是同样的收费体系，否则在上面走的车每个车都不一样，根据你的体系，你是我的车队你就行。

费方域：你这个问题提的已经很明确了，我们一个一个来，以你这个例子来讲，它现在自己里面有交叉补贴，对外有歧视问题，如果出现这个问题剩下的问题是什么呢？政府管理的问题，你的问题政府要出规则，然后要执行规则。

要么就政府不允许它这样做，不允许搞关联，不允许进来。要么进来以后必须透明，两面都要一样，如果发现不一样就吊销你执照或者是罚款，后来要有管理规则出来，然后再执行。

乔依德：我也发表一点意见。刚才听了各位讲的确实很受启发，包括一开始秦朔讲的，还有高峰讲的，很重要的一条是政府的定位会影响到下面的做法，是推动经济发展还是建立市场规则，在做法上会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秦朔也讲了，很多政府的偏好在创业或经济发展。现在中国的网络应用是领先全球的，要打国家品牌。政府的职能到底是什么？如果政府的定位是建立公平市场秩序的话，有些东西要有分类。

刚才秦朔也讲到了，现在人家都愿意给它融资，你可以想象到的各方面几乎都囊括在它下面了。所有大银行都排队了，这样是不是一定好？什么东西全都由这几家做。

秦朔：互联网应用的前 20 里有 15 家都在它们的体系里。

费方域：网络就有这个特性。

高峰：短期是鼓励了创新，但长远来说，跟生态不符合的就会被迫退出。

费方域：没有人可以写终止符号的，不管是谁。

傅蔚冈：别看现在 BAT 如日中天，或许过两天就消亡了。

左学金：有些问题是可以预防的，对于过度的垄断行为政府应该监管。

秦朔：刚刚乔老师讲的，究竟是发展型政府的定位还是法治型秩序型的定位，不一定那么绝对地讲，应该是发展型

往法治型、秩序型的发展。

高峰:像证监会股灾出问题，证监会出来是要保证合理有序的市场，还是为了冲 5000 点、6000 点？这是本质的问题。

傅蔚冈:说到这个，我想补充一下，在两年前我就写过一篇文章，说中国的证监会更像是证券发展委员会，而不是证券监督与管理委员会。

乔依德:我再补充一点，所谓的利益冲突在我们国家很少有概念，在国外非常强调。我刚回国时大吃一惊，到医院里去，看到药的广告都贴在墙上，公立医院为了收入帮助私人推销药品是完全不对的，这是现实的例子。

上海图书馆凭芝麻信用分，达到多少分就可以办卡，认为你有信用。当场我就跟他们说，这个做法是欠考虑的，芝麻信用分是私人的东西，而你是拿老百姓钱的公共图书馆。

高峰:这个是可以的，从商业上来说如果对芝麻信用有追溯，无非是信用，相当于我给你付押金了。

费方域:信用好可以免押金。

左学金:一般人去车管所开交通违章的罚单要排很长的队，但是你只要用工商银行的银行卡加入畅通车友会就不要排队了。

傅蔚冈:那个信用卡叫牡丹畅通卡，是由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合作的信用卡。

费方域:前两天杭州有个信用城市会，杭州图书馆的馆长是作为正面例子来发挥的，原来图书借不出去，现在鼓励图书流动，对外地也要开放，要有押金，信用好就不要你押金了。另外一个例子是原来在机场的通道，信用分好的话可以享受特殊通道，可以先进去。

左学金: 如果没有基础设施功能是完全可以的, 如果是带有公共的基础设施功能的话这样做会造成不公平竞争, 因为它有垄断性, 不是人家可以轻易竞争的。看你能不能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作为你的宏观政策目标。

费方域: 如果带是有基础设施服务性质, 你不应该有歧视的, 要补贴自己回去补贴。

傅蔚冈: 它们把问题从外部并成内部结算。

刘胜军: 不同的场景是不一样的。酒店用芝麻信用抵押金大家没有什么争议, 但到图书馆就有争议了, 因为属性不一样。

费方域: 这个有好处, 本来是有押金, 现在押金不要了。

刘胜军: 要看你有没有影响到一些人的正常阅读需求。

乔依德: 等于在帮助推销芝麻分。

刘胜军: 那要界定, 图书馆有没有从中拿到商业利益。

高峰: 这个很容易界定的, 因为马上腾讯也要有自己的信用评级。如果你对腾讯和阿里芝麻同时开放就可以说是征信的办法, 我用的是基础设施, 这家我也用, 那家我也用。但如果阿里芝麻是排它的, 那就是收钱了。

乔依德: 再想讲另外一个问题。现在大家都讲汇款挺方便, 我4月份到美国去, 跟一个朋友聊天说从中国汇款很方便, 有人帮我订房间4000多元, 我支付宝一秒钟就过去了。我的朋友说, 在美国把安全看得比较重要, 这在美国是绝对做不了的, 个人一定要通过银行。

高峰: 新的技术手段以后这些东西都很难, 这是社会渐进的法治过程。比如说我们国家卖很多理财产品, 要求你300万以上, 在美国投资私募和公募的区别是被认可的投资

者，当你每年收入 25 万，净资产 100 万，这样你投资是风险自负。我们国家呢？你说门槛是 300 万，单位里一个人出 50 万，6 个人弄一笔就过去了。在美国会牵扯到很多问题。第一，税谁来付？用你的名字出去应该是你来付，其他人没有责任付税。我觉得本质的问题就是政府怎么界定，法律怎么执行，很多法律是有的，但是不执行。

左学金：英文有个词叫 Political will（“政治意愿”），如果没有意愿的话很多事情就白费。

刘胜军：习近平这次讲证监会要加强监管。美国的证监会为什么那么敬业？因为你不做的话可能会碰到风险，这是整个社会的治理。

高峰：现在政府的公开透明第一步是老百姓应该有说话的权力，有问责的权力。我今天如果看到马路上有那么多共享单车，它侵占了公共空间，我能不能问责？第二步责任主体是谁？是单车公司还是用户？我理解这里面有国情。就像中国的保险跟美国的保险是不完全一样的，我在美国是个人买保险，中国的保险是跟着车走，我可以没有保险，车有保险。你没有车的话可以买，这是跟着人走，对个人的追索权，这也有赖于社会信用的建立。你开了车出了事以后你可以完全不认，但是车是很贵的，所以车只要给你扣住了就有可能财产索赔，这是根本的问题，到底最后钱是从哪出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法制和执行的问题。

费方域：我想请秦朔讲讲对无现金社会怎么看？

秦朔：最近无现金社会是因为一些超市拒收人民币，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你有现金去买东西不给你，必须要用支付宝。河马生鲜也是这样的，你必须要下载，然后用支付宝付帐。按照国家的法律是不可以的，因为支付宝虽然非常强

大，但毕竟还是个公司信用，和现金代表的国家权力是有区别的。

傅蔚冈：这一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认为商家有选择哪种支付方式自由，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拒收纸币和拒收人民币是不一样的，人民币是法定的，但微信和支付宝结算的前提也是人民币。

美国的很多地方大家是希望你用现金的，这样钱就不需要上税了。后来我看了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很多地方也不用现金，他说我拒绝用现金，现金管理起来的成本很高，怎么办呢？就只用支票，支票的交易成本会低很多。美国财政部解释作为私营机构是可以采取他所想要的支付方式。后来一想为什么这么规定呢？第一法律上是这么解释的，当商家拒绝你使用现金的时候，和你没有发生债权债务关系，所以是可以拒绝你使用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如果要有法律来确定你必须使用哪个东西的时候，成本会高到难以交易的地步。我自己遇到过例子，无人售票只能投1块钱和5块钱，难道我主张公交公司必须找零吗？难道我必须要求我的信用卡到公交车上刷卡吗？或者我到菜市场，因为支付、信用卡、支付宝后面结算的都是人民币，难道你可以要求另外一个小摊贩说必须用支付宝吗？我觉得基于自己的成本因素他是有可以选择的地位。

还有另外一点，盒马生鲜有会员店，这个是给会员用的，不是会员不能用的。就像我们家楼下的麦德隆是必须办会员才能进去买东西的，很早的时候只有企业机构才可以办，商家可以选择，要求什么样的顾客。前提是整个社会还是存在着很多竞争的机构，你不到我这里买，你拒绝我，

我还有很大的选择。

秦朔：现金作为历史的传统是最普惠的东西，大量的中国老百姓只有现金，没有别的方法。我父亲就没有手机，他怎么办呢？我认为这个央行应该有很明确的回答，我认为你想推什么都可以，会员店是一回事，数以亿计的老百姓你告诉他自己的现金很多地方不收。

左学金：人民币和现金还是两个概念，支付人民币不等于支付现金。

秦朔：你看过人民币管理条例吗？

傅蔚冈：我看过，从来没有提到拒收现金。

秦朔：央行需要表态。

费方域：不需要这样解释，现在是两个问题，同样推这件事，你让它变成老百姓自己的选择，他觉得现金方便就用现金，觉得支付宝方便就用支付宝。

左学金：买股票能用现金买吗？很多东西已经不能用现金。

费方域：你讲的不错，但反过来说在超市里面买东西，过去的长期习惯是用现金买的。

秦朔：股票是基于开户的特定条件，通过银行转账系统。

左学金：河马生鲜也是的，很难界定。

乔依德：这个暂不深入讨论。我总结一下，我觉得今天的讨论可以作为开始，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包括怎么来界定这些公司是不是互联网基础设施，或者它的一部分业务属于基础设施，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区别。

在这个问题下，就是我们讲的垄断或者支配性的问题。这当中又有问题，就是政府应该起什么作用，它的定位在多

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司的发展方向。政府还是很重要的。我插一句，我一直不太满意“互联网+”这个说法。华为现在提出来“+人工智能”，你可以“+互联网”，但不一定什么东西都在互联网上。“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是帮BAT做口号。

我们还是要肯定互联网、移动支付给大家带来了很大便利，对创业、打破以往的垄断等等还是要肯定的。在肯定积极作用的情况下，审慎地考虑这些问题。今天的研讨会就到这里结束了。

